





封二上：市新研会领导慰问三老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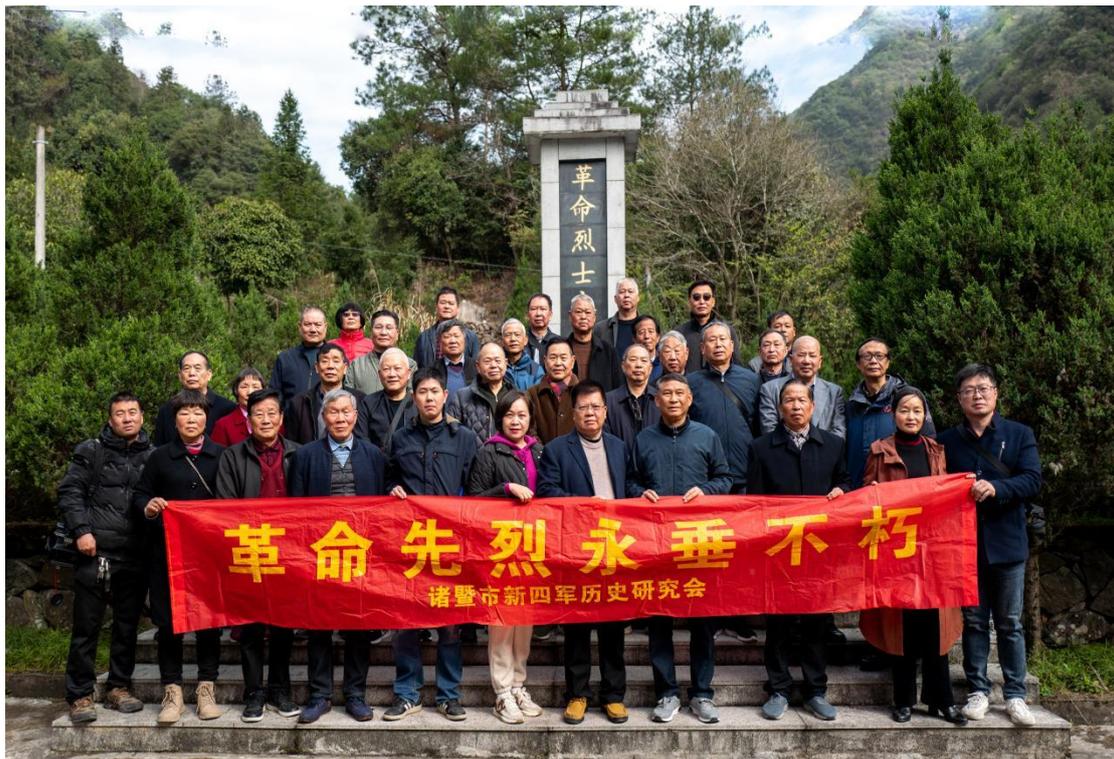
封二下：市新研会会员对本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张建国摄）



封三上：副会长陈志堂等人与周浙平先生交流（寿国明摄）



封三下：中共诸暨一大纪念馆雕前合影（杨威林摄）



封四：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合影

卷首语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5A 社团复评成功

闻 宣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于 2015 年 12 月，在中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首次获得 5A 级社会组织荣誉。2022 年，在参加诸暨市 5A 等级社会组织评估中，最终以 970 多分的最高分顺利通过复评。

近几年来，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学术研究、红色宣讲和走进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和关爱老战士等方面成绩显著。2022 年，按照 5A 社会组织要求，建立了本会功能性党支部，确定了组织机构框架，制订了本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内部机构岗位职责，进一步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文书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此外，组织会员开展了对本会的无记名投票评议活动，获得全票“好”的评价。

2023年第1期（总第57期）

2023年6月出版

目 录

卷首语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5A 社团复评成功 闻 宣

岁月回眸

父亲金城在延安七次上书毛泽东 金 戈

密写在《三国演义》里的暴动指示信 赵 村

今日老区

关于同意认定丰江周村为革命老区村的批复 绍兴市民政局

一座红色丰碑在杭坞山下崛起——记革命老区村侠父村十年蝶变 汪仙民

革命老区黄家店村接受省军地共建示范点考评 黄政权 汪仙民

佳作选刊

浣溪乡校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 杨 敞

一个金萧老战士的不凡人生和家乡情结 边自豪

泰安调研

追忆泰安战斗 寻访诸暨英烈——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

学术委员赴泰安调研 李科才 章可萍

千里寻访解放泰安时牺牲的诸暨英烈 闻 宣

追 寻 方守根 杨黎建

泰山挺立，丰碑永恒——追寻泰安战斗牺牲的诸暨籍英烈足迹 郇林春

探访红色之旅，追寻烈士足迹 徐治贵

追忆英烈 寻访足迹 寿绍方

寻找失落的英魂——泰安千里寻亲记 杨威林

会里会外

我会走访慰问“三老”人员 李科才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祭奠金萧支队烈士 闻 宣

我会派员赴陶朱街道金村和姚江镇梓尚阁村调研 寿国明

我会副会长陈志堂等拜访周浙平先生 寿国明

纪念金萧支队成立 80 周年摄影大赛开启 闻 宣

我会开展“走清风廉路 传红色基因”主题活动……………李科才

封 一：山东泰安革命烈士纪念碑（李科才摄）

封二上：市新研会领导慰问三老人员

封二下：市新研会会员对本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张建国摄）

封三上：副会长陈志堂等人与周浙平先生交流（寿国明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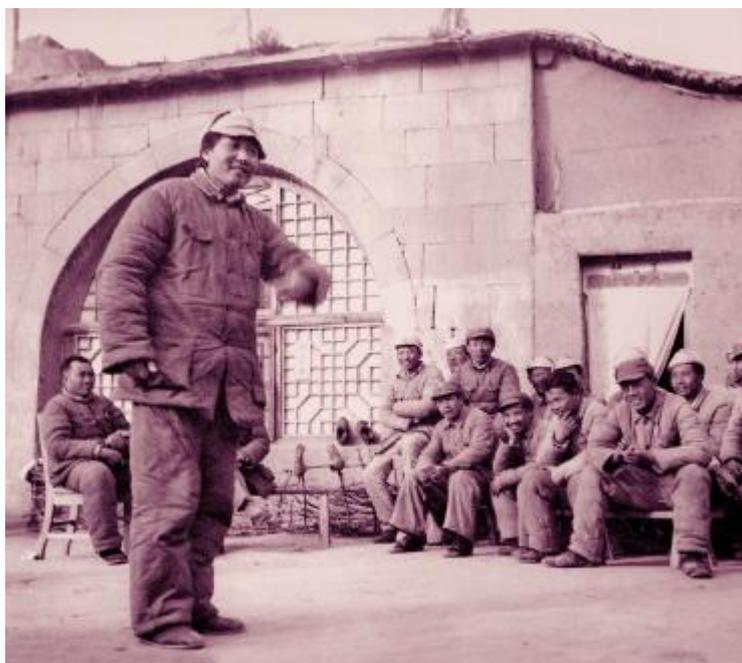
封三下：中共诸暨一大纪念馆浮雕前合影（杨威林摄）

封 四：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合影

岁月回眸

父亲金城在延安七次上书毛泽东

金 戈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从1942年上半年开始，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次全党整风运动。中央下发了22份文件，全党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纠正学风、党风和文风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歪风，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从1943年4月开始，我党开展了审干运动，这是一次清理组织的运动。

这两大运动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又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坦白”运动，一下子把水搅浑了。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审干运动引入歧途，用逼供信、车轮战术逼迫当事人“坦白”，把许多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打成“汉奸”“日特兼国特”，使他们遭受冤狱迫害，直到1944年春，历时半年多。毛泽东得到多方反映的情况后，立即着手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

当时，我父亲金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交际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中央组织部严格审查、选拔的。住在交际处的内外宾客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友党、友军及各民主党派来延安的上层人士以及社会贤达等。短期宾客很多，交际处需要安排他们参观、访问、会谈或受中央领导接见，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另外，交际处还有一批常住客人需要照顾，工作任务十分繁忙。所以，中央决定交际处干部只参加整风学习，不搞审干运动。但是，一旦有单位揭发、检举出交际处的个别人员，交际处也要配合工作，一般是按上级指示送往有关单位审查、学习，直到作出结论，再分配工作。比如，金耐就是送审查、学习后作出结论，被金城要回交际处继续工作的。又如张卓如、韩洁然夫妇都是大学生，是在其他单位作出审查结论后，重新分配到交际处工作的。

钱来苏一家遭到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

小时候，我常看到一位白发苍髯、唇红齿白的老人，以及他的女儿、女婿。他们一家是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父亲金城尊称老人为钱老，对他礼遇有加。他们住在交际处山坡上的平房里。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钱老姓钱名拯，字来苏。当年他60多岁，擅长诗文，不苟言笑，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钱老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民主革命者、反帝爱国者，曾经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领导过辽阳的立山屯起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哈尔滨任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秘密筹款援助东北的抗日军队。东北沦陷后，钱老一家避居北平。七七事变后，他摆脱敌伪监视，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到达抗日前线太原，在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阎锡山表面上喊着抗日，暗地里却勾结敌伪势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看到真正抗日的是在山西前线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后来，他认识了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并向王世英提出想去延安。在王世英帮助下，1943年3月，钱老以去西安看病为名，携女儿钱家楣、女婿孙静远一同秘密辗转到达延安，入住交际处，受到金城的热情接待。

钱老的女儿和女婿都是文质彬彬的爱国知识青年。不久，钱家楣和孙静远被送到延安大学学习。

1946年冬，钱老与常住交际处的革命烈士家属以及交际处的干部、家属一起分批撤离延安。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绥德小崖嘴村、山西临县崔家坪村。此时，父亲金城离开我们，奉命到兴县贺龙部队担任敌工部部长。1948年春，钱老随交际处机关跟中央后委一起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1949年春迁入北平。父亲金城奉调到京后，还去看望过他。钱老曾经把自己的诗文集《孤愤草初喜集合稿》——一本大部头线装书，赠送给金城，我曾经翻阅过此书。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生产运动英雄吴满友（左一）

钱老与金城为什么会成为一生的朋友呢？故事还要从延安时期说起。

钱老的儿子彭尔宁（钱家骥），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在校学习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曾随父亲到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想参加抗日，后来对阎锡山感到失望，遂与几个热血青年经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介绍，结伴来到陕甘宁边区，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改学农业。从1941年5月到1942年春，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1942年4月和6月，中宣部发出两份文件，号召在延安和全党开展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主要任务是总结历史和现实，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彭尔宁积极响应号召。一天，他满腔热情地在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色彩明丽的向日葵，用葵花向太阳来表达青年心向党的感情。不料，他的画被康生知道了，康生一口咬定向日葵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诬陷彭尔宁“心向日本帝国主义”。

康生于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社会部的主要任务是清除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是一个重要的机关。国共合作抗日以来，日军和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到延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务们混入机关、学校党

团组织内部，进行暗杀、窃取情报、破坏生产等活动，十分猖狂。因此，从组织上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的敌人是必要的。所以在整风开始后，在1943年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话宣布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从组织上清理干部队伍。但是，康生是个一贯极“左”的人，自从担任社会部部长以后，已经制造了多起冤案，如“李凝案”“王遵徭案”等。

此时，康生更借审干之机大搞扩大化，不仅继续残酷斗争王遵徭等人，还于1943年7月15日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变本加厉地整党内的干部，包括来延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他抓住彭尔宁案大肆渲染：彭尔宁来自日军占领的北平和阎锡山的长官司令部，是“日特兼国特”。康生组织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对彭尔宁实施监禁，采取三班倒的车轮战，用逼供信手段，连续几天不准彭尔宁睡觉、吃饭。在百般折磨之下，彭尔宁头疼脑晕，被迫胡编乱造供词，承认了康生给他设定的“日特兼国特”的莫须有罪名。康生大喜，把此案例印成小册子，当成“抢救运动”的得意案例四处传播。此事传到钱来苏耳朵里，他深感冤枉，内心无比震颤和痛苦。

金城为钱家七次上书毛泽东

在康生把审干运动引入“抢救失足者”歧途的背景下，钱来苏一家人蒙冤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时期，金城认真做了以下工作：一方面，他不断与钱老谈心，耐心向钱老及其家人说明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的必要性、重要性；反复恳切地表达共产党人坚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共同抗日及未来建设新中国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仔细了解钱老及其家人在运动中蒙冤、受屈、被逼供信挨整的详情及他们的心情，将运动中出现的逆流及时写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他还带领交际处干部，不断从心理上安慰、鼓励钱老，生活上关怀钱老，如春雨润物无声，化解心结，不断给逆境中的一家人送去爱与温暖。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向南下部队讲话

1944年元旦和春节，延安笼罩在“抢救运动”的气氛中，人人自危。钱老的儿子被打成特务关押，女儿钱家楣和女婿孙静远也在延安大学被审查，不能到

交际处与老人团聚。老人孤独悲伤，得病卧床不起。不料厄运进一步降临。一天，王世英被人逼迫来到交际处，让钱老“老实交代问题”。钱老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发雷霆：“当初，介绍我们到延安来的是你。今天，把我说成特务的还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走，你快走！”钱老赶走了王世英，绝食抗议，以此捍卫自己的名节和尊严。

交际处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机构，当时的40多名干部包括勤务员都是大学生或中学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父亲金城已经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七八年了，耳濡目染，政治修养、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面对钱老，他相信自己对审干方针的理解。出于对我党朋友的真诚信任和团结愿望，他诚恳地劝钱老说：审干是对全党干部的审查，是必要的，不是针对您一个人的。审干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每个干部的历史，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党的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王世英要您交代问题，您不是已经向他说明您没有问题了吗？那就很好！我们党要团结所有的朋友，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您要相信党的政策，请您老人家还是好好吃饭，保重身体为要。……钱老闻劝，怒气慢慢平息了，开始吃饭了。

为钱老绝食一事，金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详细报告，汇报了王世英与钱老谈话前后的情况，以及自己与钱老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认真看了报告，立即批给康生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交际处和边区政府都在南门外，相距不远。林伯渠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叫金城过去。金城去后看到，毛泽东不仅认真看了他写的报告，还在劝解的话语下画了圈圈点点，表示同意。在报告最后，毛泽东批道：“请林老、康生一阅。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提出的疑问值得注意。”康生虽看了批件，但并没有收敛。

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钱来苏女婿孙静远摸黑跑了十几里路，慌慌张张来到交际处。他一见钱老就难过地说：“我和家楣被逼不过，已经‘坦白’了。他们还审问我们您是不是特务，我们也承认了您也是特务。”钱老一听，勃然大怒，拉着孙静远就去找金城。金城正与秘书王力群谈话。钱老怒气冲冲地责问金城：“金处长，我有两点要问你：第一，是不是这里要把每个人搞成特务才算完事？外边来的人皆不能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善于运用马列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不是所有共产党员都是如此呢？是不是也有毛主席所说的搞自由主义的人呢？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越大？第二，我是王世英叫我来的，王世英究竟是什么意思？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这个（特务）的？如这样，我不如在家当汉奸，我还冒这么大风险来延安这个苦地方干什么？”金城立即劝慰钱老说：“钱老您请坐，息怒，请您不要误会嘛。我们谁把您当特务对待了？”王力群也耐心劝解了一番。

金城让孙静远坐下，询问了他和钱家楣在延大挨整的情况。孙静远说：“学校的人逼问我参加了什么组织，我只好胡说我参加了学生革新会，是家楣的叔叔钱因超介绍的。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从沦陷区出来，又经过了国统区，必定是国民党特务。我就说我是复兴社特务。他们问我党徽是什么样子的，我胡说是党国旗，问我党徽号码，我只胡编说是118号，实际上这是我在北平家里的电话号码。又问我是哪一组织的，我胡说是北平第四支部……其实，上面这些都是我被逼不过，没有办法，胡编乱说的。……有时，我真想自杀。家楣更是难受，常常抽风，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发疯了……”孙静远边说边擦眼泪，又对钱老说：“我被逼不过，又承认了您也是特务……我怕您没有思想准备，受不了，就趁着黑夜翻墙偷偷跑出来告诉您。”

金城问孙静远是否看过党中央关于对待特务的方针政策，孙回答：没有看过。金城说：“你没有学习过文件，跑出来是情有可原的。”孙得到一丝安慰，情绪平静了些。他懊悔地说：“我胡乱承认是不应该的，是我的错误。”金城又针对性地批评了他三点认识不足的问题：“一是对党的宽大政策认识不够。二是爱面子，顾虑自己的前途和与钱老的关系。三是你错误地认为，你把坦白的情况告诉了钱老，希望通过钱老证明，为你自己坦白的情况翻案。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钱老有三四年没有跟你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他证明不了你们两人的全部历史。”接着，金城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光明远大前途的党，它的政策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彭尔宁已经坦白了，但我们对钱老还是一样尊敬。……审干目的也是为了全党更团结，大家一条心，把中国的事情搞好。……”金城与他们翁婿谈了大半夜，然后让王力群安排孙静远住下。第二天，金城又电话联系请延大学委会主任魏坚把孙静远接回学校。金城又一次连夜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情况报告。毛泽东对金城的报告，每次都作了批示。

又过了几天，钱老再次找金城诉说委屈和想法：“我既不能证明家楣他们，他们又怎么能证明我，说我是特务呢？……过去是王世英派曹秘书用牲口送我来的，我头可断，志不可辱！我是怎样来的，还要求怎样去。……我想了好几天，我要是有错误的话，有三个：一、我不应该参加辛亥革命；二、我不应该抗日；三、我不应该来延安求进步。……假使我参加革命有错误的话，那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是有错误的了。”他十分委屈地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又讲了到延安后所受的冤屈，最后十分激动地提出要求：“今天我死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所遗憾者，没见到毛、朱两位，只要我能见上他们一面，朝闻道，夕死可矣。”

金城闻言，被钱来苏的坦诚感染，也诚恳对他进言，进一步向他讲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争取和团结同情我们的人，也要向不问政治的人和反对我们的人讲明中国的前途和我党的使命，使大家看到、了解我们的实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也要改变我们的反对者的态度。金城又说：“钱老您是为进步而来，林伯渠主席也希望您先休养好身体，再多看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多方了解各方面

情况，能够多读一些我党的书籍和文件，特别是研究一下整风的文件。这样，您对我们可以多一些指教，您自己也会消消气的。钱老，您在东北、平津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做许多工作，帮助我党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您最近受很多气，我对您是理解的。因为当一些事情涉及每个人的利害关系时，都会产生一些矛盾想法，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一样的，我是理解您的。但是，请您相信，审查干部，共产党对每一个干部都是要审查的，目的是为了大家都好一心一德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不是为了树立敌人越多越好。但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误会，而使人产生反感和敌意。这是您一时想不开的缘故。其实，只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真理，最终总会水落石出，搞清楚的。”钱老听罢，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明白了，应该为了大我，忘了小我。从今天起，彭尔宁、钱家楣、孙静远都和我没有关系了，这3个人以后都贡献给党了。”他站了起来，拄着拐杖走了。这次谈话后，钱老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金城当天把与钱来苏谈话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让文书复写成多份，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机关。及时汇报下情，这是毛泽东多年前对他的要求，已经形成了金城的工作习惯。这份报告是1944年2月6日送上去的。

2月8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金城同志：钱拯应优待他，他可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对金城这份报告，毛泽东更为重视，在许多反映重要情况的句子下边都画了粗粗的杠杠，说明他对“逼供信”“可能发生误会而使人产生反感和敌意”等问题十分注意。

“文革”中，金城被中央专案组关押审查多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给他平了反、恢复了工作。胡耀邦建议他写关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说：你在延安那10年，做了许多工作，很重要！希望你写回忆录，为研究党史留下史料。为此，金城曾经多次抱病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资料。但经历战争岁月，不少重要档案资料都遗失了。所幸，金城关于钱来苏一家遭受冤屈的七次报告保存了下来。金城据此写下了回忆文章，这是后话。

毛泽东赔礼道歉，出台甄别政策，领导整风和审干回归正道

毛泽东在作出最后这次批示后不久，就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出席西北局系统（包括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联防司令部系统）的干部大会，金城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并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出了一些问题，但也搞得过火了，误伤了很多同志。我现在代表党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边说边摘下帽子向台下鞠躬敬礼。接着他又说：弄错了怎么办呢？被审查的同志要有个正确认识，审查了你一下，让你受了委屈，这是坏事，但另一方面也是好事：一、经过审查，你没有问题，党更加信任你了，你可以放下包袱，放手工作了。二、你们是干部，将来免不了去审查别人，你们吃过“车轮战术”“逼供

信”的苦头，将来就不会用此法去对付别人，而会懂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审查别人的人，还是被人审查的人，都应从这次运动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毛泽东的讲话，说到了金城等广大干部的心坎里。

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关注“抢救运动”各方面的情况。一次，康生要枪毙一个被打成“特务”的人，要召开公审大会，毛泽东知道后予以制止。毛泽东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批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这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1944年春，党中央出台了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接着出台了9条具体政策，成为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的有力武器。

各机关、学校、团体开始了甄别工作，结果发现99%的案件搞错了。受冤枉、受诬陷的同志，被一批批平反、释放，安排工作。钱老的女儿、女婿恢复了名誉和学习。彭尔宁也被释放出来工作，但是因为他是康生抓的典型案，康生始终没有作过一次检讨，也不准给他平反，所以他一直遭受歧视。

钱来苏通过整风、审干的曲折经历，进一步感受到共产党的光明正大和自我纠错能力，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同时，他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积极参政议政。1948年，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春，他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钱来苏的儿子彭尔宁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关系，始终没有摘掉“特务”帽子。“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折磨，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之后，他38年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可惜，他的青春、才华已被耽搁了，人已进入古稀之年。他的妹妹钱家楣，很快被甄别平反，调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钱家楣与孙静远分手后，和新华社同生死的战友温济泽结婚。北平刚解放，她就回到了少年时离开的古城，担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为祖国的广播事业一直工作到离休。

密写在《三国演义》里的暴动指示信

赵 村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政治形势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诸暨的共产党人有的英勇牺牲，有的被通缉而避走他乡。但留在诸暨的共产党人，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仍隐蔽在农村，继续从事发展党员、宣传发动群众等工作，不屈不挠继续革命，经过艰苦努力，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于1927年9月底在城南滴水道院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使诸暨的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革命者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壮大组织，领导农民取得了减租抗租等群众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以诸暨为中心的浙西农民暴动奠定了基

础。

1929年，诸暨遭受特大水灾，许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而财主却趁机吞并土地。1930年春，全县饥荒更加严重，国民党县政府又搞“土地陈报”，清查漏缴“钱粮”的土地，加重对农民的搜刮。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发起来斗争。2月，诸暨下北农民组织饥民会，将地主的63袋稻谷平均分给饥民。

春荒严重，而地主却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变本加厉的剥削，使农民渴望共产党能为他们主持公道。中共诸暨临时县委审时度势，在西斗门村小学召集临时县委、北区区委和所属的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发动与组织农民破仓分粮。

4月1日，在中共临时县委的领导下，西斗门及附近近千名群众，冲进豪绅地主和国民政府县参议员的大院，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大人一石，小孩五斗。当天中午，接到密告的驻姚公埠国民政府警察立即全副武装赶到西斗门镇压，西斗门农民与其英勇搏斗，迫使警察撤退。后国民政府派省保安队赶来镇压，由于得到附近山头监视哨的通知，参加破仓分粮的骨干及时撤退。

西斗门破仓分粮是诸暨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先声，鼓舞了农民迫切解决饥荒的信心，同时也展现了诸暨良好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引起了省委的重视。

1930年4月5日，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化名李品三，带着《中央70号通告》来到诸暨。《中央70号通告》的主要精神是：党不再继续执行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进攻城市。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可以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并决定在浙江发动以诸暨为中心的浙西总暴动和杭州附近十几县围攻省城的暴动，达到“夺取一省胜利”之目的。

在下北西斗门，中共诸暨临时县委向卓兰芳汇报了西斗门破仓分粮的情况。随后，卓兰芳在西斗门小学内召集临时县委、北区区委及所属的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在全县发动破仓分粮的斗争，以西斗门村为中心，扩大斗争区域，武装农民，组织诸暨地方暴动。接着他又到大东、小西和下南等区召集区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会议，布置破仓分粮斗争和准备地方暴动。

4月16日，卓兰芳在中区翟山村召集中共诸暨临时县委会议，提出了暴动计划。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对暴动计划提出异议，认为暴动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为此，卓兰芳决定撤销原临时县委，重建了以何达人为书记，金树望、张文谦为委员的诸暨县委，拟定暴动计划，确定各区暴动负责人，其中大东区为何达人、陈伯清。计划组织农民在全县同时发动破仓分粮，集中力量进攻枫桥、牌头、草塔等集镇，再合成两路，同时进攻县城。

暴动前夕，卓兰芳给何达人并大东区委手写了一封指示信，为保守机密，卓兰芳把这封信密写在《三国演义》的书本里。他在信中简要分析了西斗门和全县暴动的形势，认为“全县各区斗争之迅速发动，以牵制敌人的进攻，否则，斗争必然易被敌人分头各个击破”，并对大东区的行动时间、方法和步骤进行了部

署，要求：“一律于明日上午发动起来，立刻武装农民，编成农军（十人为一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三小队为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二个大队以上编成纵队），……捣毁（不要烧）各反动党政机关，必须这样坚决的进攻，才能激起群众思潮之奔（澎）湃，而给反动阶级的基础一个根本的肃清”“群众斗争的行动要迅速，破仓分粮不要计较斤两，约略数量分散（这样便可以快），反对土地陈报的行动也是一样，一村做完之后，便做第二村，去发动群众”“农民委员在群众大会中即刻成立，□□一切工作应由农民委员大会名义去□□，不要党员办，标语越多越好……。”最后还要求何达人：“如遇紧要关头，要放大魄力，当机立断，切不迟疑不决。”

党领导下的诸暨各区农民暴动，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前后坚持了一个月，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又缺乏作战经验，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当年10月，诸暨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卓兰芳在杭州召集一次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于1930年11月24日壮烈牺牲，时年30岁。时任诸暨县委书记、大东区暴动负责人何达人，1930年9月任杭州中心县委书记，11月8日被捕。次年3月26日，年仅24岁的何达人在浙江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诸暨农民暴动尽管失败了，但是在那黑暗年代里，参加暴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中国革命的事业不屈不挠，不惜自我牺牲的英勇气概和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高贵品质及英勇豪迈的形象，已深深铭刻在诸暨人民的心里。而这份写在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密信也保留至今，珍藏在浙江档案馆，成为诸暨农民暴动的一个见证。





今日老区

关于同意认定丰江周村为革命老区村的批复

绍市民（2022）46号

诸暨市民政局：

《诸暨市民政局关于要求认定丰江周村为革命老区村的请示》（诸民〔2022〕4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丰江周村认定为革命老区村。

绍兴市民政局
2022年11月23日

一座红色丰碑在杭坞山下崛起

——记革命老区村侠父村十年蝶变

汪仙氏

侠父村位于诸暨市店口镇西部。2006年，该村由店口镇陈姜、姚家墩、长澜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村名以抗日统战英烈宣侠父的名字冠之。宣侠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在西安八路军联络处协助周恩来工作。1937年9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宣侠父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1938年，宣侠父在西安回平民坊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然后秘密杀害，年仅39岁。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为宣侠父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宣侠父是诸暨籍最著名的革命烈士之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被列入全国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9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是绍兴籍六名抗日英烈之一。1986年，长澜、姚家墩二村都经绍兴市民政局批准为老革命根据地村。侠父村坐落于省级森林公园杭坞山下，三面环山，环境优美，钟灵毓秀。据《越绝书》记载：“杭坞者，勾践航也。”杭坞山与钱塘江遥相呼应，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海拔583.8米，传为越王勾践系舟之坞，是古越国的生息之地。侠父村区域面积8.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16.6亩，山林面积7255亩，农户1289户，村民3728人。现村党委下设3个支部，有党员139名。

2011年以来，侠父村两委会带领全村村民，以宣侠父红色精神为引领，以杭坞山绿色生态为依托，以长澜古色村街为基础，克服困难，奋力拼搏，开拓创新，激活发展潜能，促进红色、绿色、古色旅游发展，壮大村级产业规模，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在创建美丽乡村，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上闯出一条新路子。如今侠父村已经创成省级3A级景区村，先后荣获“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第四批“浙江省党史胜迹教育基地”、“绍兴市文明村”、首批“绍兴市红色旅游教育基地”、“诸暨市美丽庭院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知难而进 责无旁贷

2011年，村两委会换届选举后，村庄处于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状况，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欠下了近500万元的债务，村民拖欠村债务问题严重，村没有名气也没有村庄建设项目。村民用自来水现象混乱，医务室租用民宅，幼儿园房屋和设施简陋，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教育等等。村里承受着面对开源资金匮乏，支出逐年递增两座大山。村容村貌不容乐观，大多数村民住宅、古街及古建筑陈旧破烂，道路坑洼不平，桥梁稀少，环境脏乱差，村民自行治理难点诸多。侠父村成为店口镇的一个荒落村。2011年前，村里没有一块诸暨市级以上的奖牌，村级荣誉远远落后于周边村庄。



当时的宣侠父故居

村两委会新班子上任后，面临着宣侠父烈士故居破损的状况。当时，宣侠父整幢故居由于历史原因房屋所有权属3户人家，有的住人，有的倒塌，有的做柴房等落脚屋，天井内碎瓦满地，杂草丛生，一棵泡桐树长成树干一人合抱大，呈现荒凉景象，看了非常寒酸。村以宣侠父名字命名，而宣侠父的故居竟是这样一个惨状，村干部们深感惭愧。村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尴尬事，一个学校慕名宣侠父烈士的英雄事迹，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带领学生前往宣侠父故居参观学习，瞻仰革命先烈事迹，请新任党支部书记王祖海带领前往，到了现场，故居是明显的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可能，考虑到安全，学生们失望地回去了。这个场景深深地刺痛了王祖海的心。2011年，诸暨市委宣传部、党史办、市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店口镇党委政府等领导非常关注宣侠父故居的修缮工作，多次来踏勘现场，指导工作，提出具体修缮方案建议。同时，王祖海了解到宣侠父曾工作过的甘肃省玛曲县建起了宣侠父烈士纪念馆，藏区人民建造了6块宣侠父烈士纪念碑。而侠父村作为宣侠父出生和少年时生活的故居成这种状况，两边的比较形成显著的反差，王祖海感到无比的内疚。势在必行，各种因素激励着王祖海，他深感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必须肩负起这个重任，以安慰英烈。他先后多次召开村两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修缮宣侠父故居事项。

痛定思痛，面对全村方方面面的问题，村两委会班子分析现状，找准原因，提出整改意见，研究落实措施。大家统一思想，引成共识，要发动一切力量，齐心协力，充分发挥村红色人文景观、绿色自然生态、古色村街建筑的优势，克服薄弱环节，真干实干加大干，在这方红色热土上，绘出一张新蓝图，向全体村民交出一份侠父村旧貌换新颜的满意新卷。

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两委会班子成员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决心从理清旧账，盘活村集体经济发展；挖掘红色要素，打造3A级景区精品村；破解难题，开创村庄治理新路子等方面着手，努力把侠父村建成村强民富奔小康的美丽乡村。“既然叫侠父村，就要对得起村名，对得起英烈！”新上任的党支

部书记王祖海是这样说的，他也就是铁了心这样去做的，他把自家的企业全部交给儿子打理，自己一心扑在村的工作上，毅然踏上“守护红色根脉，打造美丽乡村”之路。

认真理清旧账，盘活集体经济。村干部不断摸索前行，寻求村级经济发展和消薄结合点。通过档案整理，发现村民欠村遗留款项共计70多万元，村两委会干部走程序用人情，挨家挨户运用口头劝导以及书面通知等理性方式进行催缴，收缴应收款50余万元，进一步理清村级账务，为推动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因地制宜，探索红色产业经济。随着村庄创建3A级景区，知名度不断提升，通过引进建设项目，盘活资产以及积极争取奖励补贴等努力，还清500万元欠款，村级账户金额有一定结余。2018年，侠父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00余万元，从一个负债村转而成为发展红色旅游的景区村，这是侠父村敢于理清旧账后，8年来努力奋战的直观成果。

修缮侠父故居，树立红色丰碑。2011年开始，党支部书记王祖海带领村两委会干部开始筹备宣侠父故居重建。整整利用5年时间，王祖海与镇、村干部一起搜集有关宣侠父的历史资料，走遍了甘肃、台州、西安、广州等10多处宣侠父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背回大量的珍贵影像和文献资料。还到北京、杭州等地寻找宣侠父亲属收集资料和实物，充分做好故居重建的准备工作。

2012—2015年，王祖海背起行囊外出搜集宣侠父事迹资料。从诸暨党史办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从广州黄埔军校到甘肃省博物馆，凡是宣侠父曾经到过的地方，王祖海都走了一遍，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跑了三趟。在外人生地不熟，困难重重，任务重，压力大。在去往甘肃玛曲7个半小时颠簸的大巴车上，看着窗外，王祖海不禁想到，当年宣侠父独自骑马在甘南草原上播撒革命火种的艰辛画面，心潮澎湃。辗转抵达玛曲县，王祖海便下定决心，决不打退堂鼓，一鼓足气，一定要把各地党史馆里的宣侠父历史资料都“搬”回家乡。那次回家，他的行李箱里装回了上百斤珍贵的党史资料。

为解决故居的归属问题，村干部对另外2户房屋主人逐个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分头到诸暨市委宣传部、党史办、民政局、土管局、博物馆、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部门，汇报情况、出具证明、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等，通过政策处理到位、思想工作到家，妥善地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难点，使2户人家顺利地搬迁出来。

2012年开始，经镇、村干部千辛万苦的奔忙下，筹集资金270万元。2015年，在市、镇相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宣侠父故居修葺一新，展陈丰富详实，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出来，成了侠父村的一块金字招牌。



修缮后的宣侠父故居

创新村庄治理，提升凝心聚力。村两委会干部通过一系列创新治理，提升村庄凝聚力和干事积极性。两个办法破解环境治理难点。一是通过“三面红旗”提升全村农户房前屋后卫生情况，将全村农户分为11组，通过党员、村民代表带头负责包干区内卫生，把农户卫生情况分“已上门劝说”“已初步清理”“已完成清理”进行上墙公示，并由网格员负责长效监督。二是“烟蒂头换生活用品”，开创以一斤烟蒂头换价值20元左右生活用品的政策，仅两个月就收了27斤烟蒂头，村内妇女老少平时走路散步都会捡拾烟蒂头，宣传垃圾分类，极大地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一个协会打通干群联系堵点。2018年下半年，村两委会动员乡贤企业家代表带头，成立侠父村关爱互助协会，短短1个多月，在企业家、党员代表的带头下，有300户农户参与了捐款，募集了50余万元。10年来，村里对57户特困人员发放了关爱互助金，村内企业家们纷纷出资捐献了200多个花箱。通过这一举动，提升了全村团结互助的风气，改善了村容村貌。这些行为，都使村民们更加凝心聚力，村庄氛围更加和谐。



乡贤助力“五星达标”“3A争创”

守红色根脉 助乡村振兴

2019年，侠父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省级3A级景区村，村部办公楼会议室挂满了琳琅满目的“省级文明村”等奖牌、奖杯和锦旗，她们记载着侠父村巨变的轨迹，诉说着村干部艰辛拼搏可喜可贺的辉煌业绩，歌颂着全体村民付出的勤劳汗水。



今日长澜街

2023年4月，笔者来到侠父村古色古香的长澜老街，看见宣侠父故居装扮一新，点缀的红灯笼高高悬挂门口，故居大厅正中摆放着宣侠父的半身雕像，故居内陈列着宣侠父革命事迹，厨房、书房、卧室都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在宣侠父故居旁，是宣氏宗祠等一座座散发着古韵的老台门。宣侠父故居修复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此参观学习。2022年，最多一天接待参观学习团队11批次，省、市领导多次到村指导工作，诸暨市市长张昆仑把侠父村定为他本人的联系村，经常来村帮助指导工作。这些给侠父村带来巨大的效应。2019年，侠父村成功创建省级3A级景区村，成为店口镇首个省级3A级景区村，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旅游基地。难得空下来后，王祖海就会跑到故居当义务宣讲员，为讲全、讲实、讲好宣侠父故事，他的喉咙落下了病根，声音略略暗哑，但40分钟的解说，王祖海依旧激情不减。2022年，故居接待了近2万名游客，王书记为各地来的党员作解说、上党课26次。他带着重走侠父革命路的收获，生动传递着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侠父村推动“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古越文化”融合发展。村借助宣侠父故居这张“红名片”“金名片”，吸引了大批人流，宜学宜居宜游的侠父村逐渐成为高人气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杭坞山是省级生态公园，曾是古越先民活动地，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在杭坞山游步道沿途及山顶开设青少年红色研学项目，做好研学游这篇文章。结合长澜人文历史，古迹古街、古代传说等，充分挖掘古越文化，在山冈上修建好“三德寺”古建筑，将杭坞山重塑为一座古越文化名山。2021年，侠父村被确定为清廉村居示范点建设村，通过对原有宣侠父故居、宣氏祠堂（清风馆）、民风广场、长澜老街、杭坞山等自然人文景观的提升和串联，打造一条主题为“清廉侠父，红色文旅”的廉旅线。线路主要包括文化礼堂展清韵、侠父故居显廉魂、杭坞山上享清风、民风广场话廉情、长澜老街倡家风等节点，展示清廉人物故事、优秀家训家规、村级权力阳光运行等内容，成为纪念先烈宣侠父、推进清廉文化建设新阵地，引导党员干部、村民在日常生活上廉洁观念入脑入心，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目的。



杭坞山绿色生态园

村建立起游客接待中心，成立了浙江澜天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诸暨市澜天商贸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村旅游开发的组织领导和实体经济，创造出集参观、学习、旅游、观光、健康、养生于一体的美丽乡村典范。10年来，来村游客不断，累计接待游客7.6万余人。村逐将闲置办公楼改造成民宿，精心布置房间、餐厅、会务室等。村里的绿色旅游民宿“大璞清风栖居”已开业，远近游客纷纷前来预订客房。红色招牌、绿色生态、古越文化为村带来了活力，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发展了集体经济，让村民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

10年来，侠父村两委会大力加强村基础设施项目，着眼于民生实事，侧重于加强惠民工程建设，致力于村农贸市场、村部大楼接待中心、幼儿园、医务室、村内道路白改黑、汽车公交站、文化礼堂、自来水改造、桥梁新建、爱心食堂、民风广场等等20余只惠民实事工程，村庄的基础设施有了较大变化，让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借着挖掘红色基因，侠父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走得踏实有力。



侠父村风貌

走在侠父村，到处可以见到红色文化印记。侠父精神、红色文化在这里形成巨大的文化“气场”。红色文化建设也提升了村庄面貌，村里的小巷小弄清洁干净、一尘不染。村庄内到处都能看见美丽的景观小品，村民生活蒸蒸日上，呈现出新时代共同富裕新高地。“山河变迁，英雄犹在”。在宣侠父烈士精神的引领下，侠父村人的精、气、神都有了巨大变化，村庄成为美丽家园，成为红色旅游教育基地，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先行试验地。如今，侠父村宣侠父故居及英烈事迹成为杭坞山下一座红色丰碑，侠父村成为当地的红色文化地标。

革命老区黄家店村接受省军地共建示范点考评

黄政权 汪仙氏



5月18日，浙江省双拥模范城创建迎检工作组莅临璜山镇黄家店村，现场考评军地共建示范点，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沈志江陪同。

黄家店村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建军之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四位黄家店村的热血青年参加金萧支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黄志祥同志牺牲在淮海战场。

黄家店村涌现了一大批支前模范，其中张香莲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张香莲从东阳县嫁入黄家店村后，住在黄家店村的上坞冈山上，她的家成了金萧支队队员的养伤场地，也是金萧支队的地下联络站。她多次冒险给金萧支队传递情报和采购粮食棉被等物资，并一次次地掩护金萧支队指战员化险为夷，指战员亲热地称呼张香莲为“革命妈妈”。

在和平年代，武警绍兴支队结对黄家店村军民共建，鱼水情深心连心。武警绍兴支队结对黄家店村后，先后投入65万元强势推进黄家店村党建、产业、文化和生活帮扶，通过军民共同努力，黄家店村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子，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军民共建的红色旅游胜地。

读溪乡校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

杨 敞

1938年8月底，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疯狂打压，诸暨一带抗日形势急剧逆转。中共诸暨县委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转变斗争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诸暨地方党组织为培养革命人才，积蓄革命力量，在浣溪乡创办了一所乡级中心小学，即被誉为诸暨小抗大的浣溪乡校。

浣溪乡，是民国时期位于诸暨西南部一偏僻山乡，周边分别与同山、泄峰、共济及浦江中余乡等地接壤。这里崇山峻岭、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较为落后。1938年下半年，任中共诸暨县委宣传部长的寿景山（1906—1986），了解到当时浣溪乡内没有一所高级小学，而山区大量失学青年有强烈的求学愿望。更为有利的是乡内党的组织“中共诸暨江东区委浣溪分区委”及下属党支部，一直是中共诸暨西南部党的中坚力量，乡长、保长又大多在我党的实际掌控之中，各村群众的进步倾向十分明显，在这里创办一所乡中心高级小学，既能满足乡内青少年的求知需求，更能为抗日武装斗争培养坚强的后备力量。寿景山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当时诸暨县委的肯定与同意，他随即联络自己的同学、时任浣溪乡乡长杨纪均（1904—1946）和时任江东区署成员的杨春惠（1894—1974），秘密策划创办学校的具体事宜，并通过当地进步人士联络、动员，组织召开了全乡保长会议，会上决定创办浣溪乡中心国民学校（简称浣溪乡校）。

学校校址选在乡内尚文村（今属大唐街道上下文村）西侧石浣溪边的暨阳蕾山杨氏宗祠，利用现有祠宇建筑改建成教室等教育设施。学校建立了以各保保长和乡内办学热心人士组成的校董会，由时任浣溪乡乡长杨纪均兼任校长，寿景山负责具体日常教务工作。首届招收甲、乙两班共106名同学，并于1939年9月正式开学。就这样，一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策划、实施并实际掌控，坐落在国民党统治地域，又具有合法办学资格的特殊乡级高级小学由此诞生。开学后学校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因材施教，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和各种进步思想宣传，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成为培养革命志士的红色摇篮，被誉为诸暨的“小抗大”。学校也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一度成为诸暨县乃至路西（金萧）地区重要的交通联络站。自1939年学校创立至1949年诸暨解放这十年间，学校形成了“依靠群众、艰苦办学、勇于革命、教书育人”的办学特色，为诸暨丰富的红色革命史增添了浓重的色彩，也为我们当今社会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依靠群众，这是浣溪乡校办学一条鲜明的特色。创办学校的设想征得中共诸暨县委同意后，首先得到担任尚文村地下党支部书记、浣溪乡第九保（尚文村）保长杨观尧（1893—1940），第八保（霞纹村）保长、开明绅士杨嘉言（1902—1973）两人的支持，两人分头组织召集保、甲长及两村村民代表会议，宣传创办浣溪乡高级小学的目的、意义，会议同意将位于尚文村的杨氏宗祠作为新校校舍，将村西面唐屏山上部分已砍伐树木出售款项，及山上现有剩余树木（均为两村公共祠产），全部捐助给办学之用及今后日常教育开支所需。尚文、霞纹两村村民基本上以杨姓为主，村内杨姓村民同属暨阳蕾山杨氏，并都是纶七公杨韶的后代。自明末清初形成自然村落以来，村民以孝德传家、善义立世。尽管当时两

村在处理共有的唐屏山树木出售款分配方式上存在分歧，但对捐助用于兴办乡级中心小学，得到两村广大村民的一致拥护。原在杨氏宗祠内的尚文村赋兴初级小学搬迁到村中央大厅——燕翼堂后宇。能利用和改造现有祠宇建筑作为教育用房，和利用现存的树木出售款作为办学启动资金，这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学校招生开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党组织和骨干寿景山等主要创建人，充分利用乡内办学热心人士、充分发动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办学过程中学校还依托尚文、霞纹等周边村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当时由杨庭朝（1910—1986）任书记的中共江东区委浚溪乡分区委，以及下属尚文、杨焕、桥头、石塔头等四村党支部的坚强组织基础，使学校成为诸暨西南部和路西地区地下党组织重要的活动中心，以及重要的交通联络站。同时面对日寇的侵入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校骚扰，当地群众的有效保护和必要的斗争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浚溪乡校办学的成功实践，是我诸暨地方党组织对群众路线和毛泽东群众观的生动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法宝，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如此，当今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积极探索实践基层治理新路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同样也是如此。

艰苦办学，这是浚溪乡校办学中较为突出的特色。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统治地区，要办成和办好一所革命的学校，要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要安全地实施地下交通联络工作，以及因日寇侵入浚溪乡内学校被迫停办后，要迅速恢复正常教育秩序等等，决定了浚溪乡校十分艰辛的办学历程。浚溪乡校在创办之时，正值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白色恐怖遍布诸暨城乡，要促成办学获得正当合法许可，创建人寿景山等同志需要通融各种上层关系，其中艰辛可想而知。1942年5月，日寇侵占诸暨县城后，曾多次窜向浚溪乡一带，百姓的生活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学校也一度被迫停办。1943年上半年经过党组织努力，学校得以重新开学。1945年日寇投降后，白色恐怖依然笼罩在浚溪山乡，乡校一直是国民党草塔警署重点控制的对象。他们把反动标语刷到学校门口，还曾叫士兵找一个毛竹筒（农村竹制日用器），谐音“毛泽东”，边敲边喊“打倒毛竹筒”，进行反共宣传，对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和当时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红色教育带来很大冲击。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经费上不足更为突出，尽管由当地座村尚文、霞纹两村杨姓村民共有祠产的捐赠助学，日常运行经费依然十分紧张。学校曾利用位于唐屏山脚一块荒地，组织师生开垦出约三亩半水田和旱地，并适时种植稻谷和蔬菜。这既给学生提供了一处劳动教育场所，也补学校日常开支之不足。回顾浚溪乡校的办学经历，客观条件的制约，及主观办学思想使然，艰苦办学是办好学校必要的保证，也是一条重要的办学特色。艰苦创业、勤俭办事，这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尽管生产力已高度发展，综合国力也今非昔比，但办任何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丢，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不能缺。

勇于革命，这是浣溪乡校办学的又一鲜明特色。隐蔽革命力量、开展革命工作、培养革命后备力量，这是当时诸暨县委创办学校时的指导思想和办学初衷，学校从筹划到日常运行，一直由诸暨县地方党组织实际把控，决定了学校革命性的本质特征。办学之初由时任乡长、共产党员杨纪均兼任校长，寿景山负责日常教育事务工作。另聘请杨春山、应一波、徐风海等思想进步人士为任课教师，后续随着学校规模扩大而相继聘任的徐行知、周孟夫、杨朝表、郭慎敏、蔡子贤、寿子野、王育堂、杨美英、马产宁等教师，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是地下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这一群体构成了学校雄厚的革命师资力量。在实际教育中，学校以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办学方针，借鉴延安抗大的校风，坚持以“生活教育、抗战教育”为教育内容，除正常教材外，从上海等地带来大批进步书籍杂志，作为师生课外阅读教材，运用讨论、论辩等方式，组织师生举行读书会、邀请地方党组织领导作形势报告和排演小话剧等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非鉴别能力。学生们还常常走出校门，把学校实践活动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广大师生勇于革命、敢于斗争，曾发生“杨芷庭怒斥督学李启璜”“杨春潮劝退校长赵昭德”“沈仁绥严惩顽匪杨纪贞”等对敌斗争故事。浣溪乡校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进入新的时代，要实现党所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完成各项具体工作任务，需要我们弘扬浣溪乡校勇于革命的斗争精神，继续发扬革命传统，自觉增强革命本领，立足岗位，创造性地做好各项本职工作。

教书育人，这是浣溪乡校办学最为显著的特色。由于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斗争才干，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既是求知的学员，又是革命活动中的参与者。1941年上半年，随着学校教师党员的增加，上级党组织在浣溪乡校建立学校教工党支部，并在首届毕业班优秀学生中，发展了沈仁绥、周德全、沈正舒、杨伟成等四名党员。不久又建立了由沈仁绥任书记的学校青年（学生）党支部。浣溪乡校青年学生党支部的建立，使学校内拥有了两个地下党组织，这是党领导的这所山区小学组织发展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在诸暨党建史上一段难得的红色佳话。同时对培养青年党员的独立工作能力，进一步做好进步学生培养工作有积极作用。沈仁绥等首批入党的优秀学生，毕业后被党组织直接派往周边山村小学担任教师，他们能独当一面，从而形成了浣溪乡内一张学校交通联络网。后续党组织又发展了杨金水、杨洪全等青年学生入党，也为毛富标等进步青年学生毕业后，直接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不久又加入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也培养、锤炼了教师，一些进入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进步青年，在这个特殊的革命氛围中快速成长成为地方革命工作中坚力量，郭慎敏、蔡子贤、杨美英等就是在浣溪乡校工作期间加入了党组织，后受党组织派遣分赴各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成为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负责人。浣溪乡校办学十年，在历届教师、学生中先后发展党员数十名，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

一百多人，杨美英、郭慎敏、蔡子贤等学校老师，以及沈仁绥、杨尧章等先后成为学校老师的一批进步学生，就是在浣溪乡校这一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的中坚力量。杨禄田、杨银法、杨贤西、寿澎年等一大批学生都是跟随老师加入到革命队伍，后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而在这一群体中有许多在抗日前线、解放战场等英勇奋战，献出自己年轻而宝贵生命。学校杨美英老师等还曾利用校内教室，面向附近村开设“女子夜校”等成人班，开展女子扫盲工作，同时宣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进步思想，引导了众多附近村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教书育人本是学校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学校教育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党所需要的人，浣溪乡校办学经历和办学特色，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个金萧老战士的不凡人生和家乡情结

边自豪

我的表姐寿柳依，1930年3月12日出生于诸暨县同山乡丽坞底村，当时正值她父亲寿松涛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诸暨县委书记，领导诸暨农民暴动失败，遭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追捕之际。母亲边之先亦在逃亡期间（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于浙江杭州陆军监狱。寿柳依从小就失去父母关爱，寄养在她外公外婆（笔者祖父母）和她的四伯父家，艰难度日。

1936年春，寿柳依的母亲边之先被保释出狱，母女始获团聚。母亲将其安置在本村益邨初小念书，然后去西安与父亲寿松涛会合，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她后来又化名杨依依，到被誉为“诸暨小抗大”的十九都浣溪乡校（高小）读书，亲眼目睹了地下党员寿景山、沈建新、郭慎敏、杨爱琴等老师精心教育学生，引导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方面面。寒暑假及平时放学后，她还经常帮助四伯父家干些割草、喂猪、养蚕、晒谷、摘棉花等农活，从小就养成刻苦学习与勤劳简朴的优良作风，也十分珍惜热爱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45年6月，时任中共浙东区路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父亲寿松涛，率部在诸暨家乡一带打击日伪顽，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有一次他受邀到柳依读书的浣溪乡校，作动员民众抗日的演讲报告，乘机将女儿柳依接出，安排她到金萧支队后方医院担任卫生员，从此15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新四军军部指示，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等部与各地方政府机关人员北撤。组织上决定，其父寿松涛与其他领导率金萧支队主力撤往苏北，寿柳依随其母亲边之先留在诸暨隐蔽坚持。母女俩克服重重困难，隐匿于家乡的深山密林之中，在地下党组织和众多亲友的掩护帮助下，辗转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抓捕，始终配合地下党组织坚持斗争，坚信人民革命斗

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1947年秋季，经地下党组织决定，安排寿柳依进入诸暨牌头同文中学，以读书为名埋伏在学校。期间蒙同文中学校长张韶九与地下党员于德馨等一批老师的妥善照顾，千方百计给予掩护，与学校政教处几个国民党县党部下派来的特务作斗争，揭露特务打击迫害寿柳依等几名学生的丑恶行径，使她们一次次转危为安。其母边之先则去上海等地坚持隐蔽斗争。



寿柳依隐蔽埋伏在同文中学时的学校教职工合影（前排左五即张韶九）

1949年4月底南京解放，寿柳依前往上海与母亲一起，赴南京同父亲寿松涛汇合，一家人历经磨难，总算重新团聚。

1950年起，寿柳依在南京市办公厅秘书处文书股工作。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蓬勃高潮，促使她复萌了继续学习之心，经组织上批准，于1952年秋重入南京市第十一中学读书。1954年8月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高中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因革命战争年代受艰苦环境、颠沛流离等影响，致使她身患多种疾病困扰而肄业。其时，又逢父亲寿松涛奉党中央国务院之命，率华东航空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西迁，支援国家西部建设，创办西安航空学院。寿柳依随父母亲一同前往，并在西安市西北大学校办公室工作。

1958年以后，她响应国家精简机构的号召，主动报名到西北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工作，期间为适应图书管理业务要求，她积极参与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期间她还考取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函授学习并顺利毕业。

受父母亲的影响，寿柳依非常关心诸暨老家以及丽坞底村的建设与发展。她曾于1964年春节期間利用寒假假期，与父母亲 and 丈夫张长久、弟弟寿晓松等一

起，专程来诸暨老家，看望慰问在乡的革命老人和曾经的战友与同学，以及家乡的亲朋好友，并共渡春节。期间，她和父母亲一起，多次与丽坞底村的干部群众一道协商讨论，共商老区建设发展大计，并当即捐款给予支持。



1964年春节，寿松涛、边之先及寿柳依等全家在丽坞底合影（后排右一即寿柳依）

1968年，寿柳依调西北大学生物系任教务秘书、学生队党支部书记，她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实习锻炼，在教学第一线积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工作能力。

1980年，寿柳依全家随母亲边之先迁往南京，她奉调到金陵职业大学（现金陵科技学院）工作。在该校初创时期，她积极发挥作用，加班加点，为学校建设奔忙，后又调到学校组织部负责党务工作。以其数十年从事院校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努力做好党员发展、支部建设等工作，努力打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

为学校初建时的党组织建设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8年寿柳依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协助钱英同志办好南京市金陵老年大学，并置身于老年大学各项专业的学习，直到2008年离校。

2015年9月，寿柳依荣获党和国家颁发的“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荣誉奖章。2019年国庆，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再次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奖章。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南京市老干部局局长由诸暨市老干部局周副局长陪同，慰问寿柳依，并授予“光荣在党50年”奖章

作为一名有69年党龄的老党员，她为抵御日寇，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经艰辛，不懈奋斗了一生，又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50多个春秋。她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工作踏实、严于律己，为西北大学、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和南京市老年大学的建设与发

展，贡献了自己的毕身心血和全部力量。

从南京市老年大学工作学习岗位离开后，寿柳依念念不忘曾经培育她成长，并早早走上革命道路的诸暨家乡。2012年以后，她毅然抛开南京市内悠闲的离休生活，选择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诸暨老家定居。到家乡的头几年，她虽已是年逾80之人，但还十分关心家乡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常邀我作为她的兼职司机，陪同她驱车走访革命老区同山、青山、马剑、紫阆等地，以及同文中学（今牌头中学）、青山渎溪完小旧址等处，寻访革命战争年代的旧地和故人，追忆当年惊险激烈的战斗场景，以及隐蔽埋伏的艰苦生活和学习环境。为了充实家乡丽坞底村红色纪念馆的革命传统教育展示文物，她还把珍藏多年的父母亲战争年代使用过的一批革命文物捐赠给丽坞底村，大大丰富了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展品内涵。

2023年1月12日，身患帕金森综合症多年的寿柳依，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诸暨市区逝世，享年94岁。遵照她的生前遗愿，清明节家属将其骨灰安放在同山镇丽坞底村，让她与父母寿松涛、边之先一起，长眠在曾经成长和战斗过的家乡，实现她的愿望和情结。

泰安调研

追忆泰安战斗 寻访诸暨英烈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学术委员赴泰安调研

李科才 章可萍

泰安攻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9月下旬，浙东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让出南方8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紧急部署浙东部队北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和金萧地方人民武装以及党政人员共1800余人赴上虞县城丰惠镇集中待命。10月2—4日，金萧支队和金萧地方人民武装在丰惠镇合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浙东游击纵队）第六支队，并于6日在余姚临山附近登船北渡杭州湾，经上海市郊赴苏中解放区。11月，在江苏涟水整编中与纵队第三支队合编为新四军一纵三旅八团。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一纵三旅八团。

1946年6月7日22时，为反击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渗透、蚕食和偷袭，一纵一、三旅发起的泰安攻坚战打响了。第八团占领粮食市街，夺取下河桥，突破元宝街敌之防御，又占领电灯公司，沿共和街、奈乌河追歼逃敌，并在

泰安（东）独立营配合下攻占博济医院，直逼城下，敌大部逃入城内。至8日16时，西关为我军全占。经调整部署，总攻于10日18时开始。第八团二营四连首先打开并巩固了突破口，将红旗插上泰安城头，后续部队迅速楔入城内，乘胜攻占了天主教堂和伪县政府，并从岱庙正门实施正面突破，开展连续爆破，配合第九团攻占了盘踞在岱庙的敌军旅部。经三日四夜激战，全歼守敌汪伪军宁春霖部40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解放泰安的重大胜利。

英烈不朽

在解放泰安的战斗中，一纵三旅八团的杨雪章、杨槐庆、张才裕等28位诸暨籍烈士英勇杀敌，光荣牺牲。此外，还有郦云千、方云泉、陈保祥3位诸暨籍烈士，也在发生于泰安县的其他战斗中壮烈牺牲。现将英烈们简要介绍如下：

郦云千（1906—1946），原名郦荣铨，次坞镇白马新村新岭脚自然村人。1945年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三连，任班长。5月在泰安战斗中失踪。1962年7月17日，诸暨县人民委员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杨雪章（1921—1946），大唐街道上下文村上自然村人。1944年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三连。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杨槐庆（1925—1946），又作杨槐青，五泄镇泄峰村青口自然村人。1943年在当地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任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慎祖年（1922—1946），大唐街道中兴社区慎叶自然村人。1943年在当地参加革命。1945年9月底随金萧支队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卫生队，任队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方云泉（1926—1946），陶朱街道白门下村下新自然村人。1944年8月参加金萧支队诸北办事处自卫中队，任机枪手。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三连。6月在泰安马家庄战斗中牺牲。



张才裕（1915—1946），曾用名张望有，暨南街道董村上董自然村人。1944年6月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任副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王庭均（1925—1946），山下湖镇泌湖村建华自然村人。1944年2月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四连，任排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洪文德（1917—1946），又名洪文光、洪山玉，安华镇三联村大园自然村人。1940年被国民党抽壮丁当兵2年。1944年在枫桥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任副排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许灿夫（1922—1946），安华镇湖头村涨墟自然村人。1945年3月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特务连。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杨浩余（1926—1946），大唐街道上下文村上文自然村人。1945年4月在当地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三连。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郭章安（1924—1946），姚江镇江藻社区东沙自然村人。中共党员。1944年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六连，任班长。6月攻打泰安县城时任突击排排长，在战斗中牺牲。

周永清（1914—1946），曾用名周永春，岭北镇岭北周社区人。1944年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

三旅八团二营，任副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惠情海（1926—1946），暨南街道王家井社区宣顶自然村人。1944年2月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石德扬（1914—1946），曾用名石小原，大唐街道路西社区大模自然村人。1943年在当地参加革命，1945年9月底随金萧支队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六连，任排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朱奎苗（1925—1946），暨南街道宜联村朱家自然村人。1943年在当地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六连，任排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闵忠法（1926—1946），又作闵中法，次坞镇新徐坞杨村百步街自然村人。1945年3月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任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俞三梦（？—1946），次坞镇新徐坞杨村里徐自然村人。1945年6月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寿中贵（1926—1946），又作寿忠贵，姚江镇墨城坞村半山自然村人。1944年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七连。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周保福（1924—1946），牌头镇牌一村拜曲自然村人。1945年8月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魏伯炎（1922—1946），又作魏伯贤，山下湖镇泌湖村大宣自

然村人。1937年8月参加革命，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7月在诸北四乡抗日联队给何文隆当警卫员。1945年9月底随金萧支队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六连，任排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何月灿（1922—1946），赵家镇大柳仙村柳仙自然村人。1944年8月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郭伟（1919—1946），曾用名郭渭桐，浣东街道诸中村新东自然村人。1944年4月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孟汉山（1923—1946），应店街镇十二都村前十自然村人。1945年上半年参加金萧支队，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孟金波（1927—1946），应店街镇三应村上应自然村人。1945年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七连。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蒋延泰（1927—1946），大唐街道冠山村童村自然村人。1945年参加金萧支队，同年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周锦贤（1922—1946），又作周金贤，枫桥镇泅村人。1938年在当地参加地下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底随金萧支队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六连，任副连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曾获“模范工作者”称号。

余贵灿（1917—1946），又作余桂灿，浣东街道高湖村西高湖沿自然村人。1944年参加金萧支队。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五连，任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杨云灿（1918—1946），又作杨永灿，暨阳街道浣纱居三踏步自然村人。1945年1月参加金萧支队，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机枪连，任通信员。6月7日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俞成章（1924—1946），原名俞良佐，陶朱街道联合村花山自然村人。1945年初参加金萧支队，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七连，任副班长。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沈伯祥（1919—1946），陶朱街道祝桥头村祝桥自然村人。1942年10月参加“小三八”部队，后与义乌“小坚勇”部队合并。1945年9月底随金萧支队主力北撤。1946年1月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三营，任通信员。6月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陈保祥（1925—1947），陶朱街道城山社区浪堰自然村人。1945年6月参加金萧支队，9月底随主力北撤。1947年1月编入华野第一纵队三师八团，同月在泰安固山战斗中牺牲。

陵园寻墓



赴泰安寻访英烈，追忆宣传这段光荣的历史，早在2022年初就已列入了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课题。2023年3月7日，随着疫情消退，我们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一行13人终于踏上了泰安这块红色的热土。

3月初的泰安，春光明媚。早上还不到9点，当我们就抵达了坐落于泰山南麓、金山之阳的泰安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始建于1953年，分别于1989年和2010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扩建，2009年3月被批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整个陵园占地80余亩，南面入口处建有高7.7米、宽14.8米的三拱式四柱花岗岩仿古牌坊，拾级而上，到达位于陵园中央的悼念广场。该广场面积有2200平方米，非常开阔大气。广场北侧是象征建国40周年的40级台阶，然后是高达34米的纪念碑。纪念碑采用白色泰山花岗岩建成，基座南面是由战士和支前民兵组成的象征军民团结、并肩作战的浮雕，东西两侧是立体式花环浮雕，北面镶嵌着13.28平方米的泰山红大理石，镌刻着泰安市委市政府撰写的纪念碑

文。碑体造型为三支步枪，上面还铭刻着毛泽东手迹“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纪念碑高耸入云，在苍茫巍峨的泰山映衬下，显得更加气势恢宏。在陵园管理中心杨丽娟女士等人的热情陪同和配合下，我们全体人员列队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默哀，敬献花篮，并环绕一周，以表达我们的崇敬与哀思。

纪念碑的后方是烈士墓区，以长 140 米的甬道为中线，14 座花岗岩大墓和 500 座青砖墓分置两侧，梯次排列，纵横成行。自南向北望去，整个墓区如同雄壮威武的方阵，安葬着 514 名烈士，其中刻有名字的仅有 179 座，335 座是无名烈士墓，署名解放泰安的新四军第一纵队三旅八团烈士墓有 52 座。

陵园管理中心根据我们事前的要求，已提前准备好了青砖烈士墓方位图和浙江籍烈士名录等资料，参照我们带去的 31 位在泰安牺牲的诸暨籍烈士资料，我们经过资料比对，并在陵园管理人员的引领下逐一进行现场踏勘确认，找到了刻有杨永灿、郭重（章）安、周锦贤、周永春、魏伯贤、余桂灿、杨槐青、余山玉等 8 位诸暨籍烈士姓名的青砖墓。家乡的烈士们能埋骨于此风水宝地，也令我们内心感到一丝欣慰。“诸暨籍的烈士们，我们代表诸暨的父老乡亲来看望你们了！”我们肃立在烈士墓前齐声呼唤，不由得热泪盈眶。

朱从德	吴志忠	吴文俊		吴金方	张治善						闫成彦		黄镇江		杨克新	刘奎林	张林生
黄茂春	周俊生	陈立本	范金河	任小牛						杨海亭	杨同志	李同志					李远生
		徐有如				周长山									万三大		
吉之桂	于阿昌	宗和斋	袁松如	高水和	何其生	陈鹿泉		楼景春		徐明芳	孙德芝			王德祥	金后元	王友伯	
孙太坚		穆汝新	张年有	洪山玉				郭重安	朱近才								徐之苗
司富元	李明章	严云教		李海春					何有根	李七保						周立民	兰阿琳
侯旺洪		吴梓桂	周永春	陈松	陈伯生	陈小宝			邵成勋	孙益新	赵炳坤						孙伯祥
								许飞明	李永英	许光德		刘佃凯	刘华范	许文保	杨永灿	张子昌	郑传化
杨槐青	李红汉	魏伯贤	张爱文	陈昌文						张现章	巩记富	林际才			周阿三	毛志英	张国太
余桂灿		王正寿	陈家孝	周锦贤	赵敦增					门喜章	孙敬礼	王维新			黄布德	骆军生	吴伯生
				陈志夫				姚兵				王言良					吴道林
朱正坤	朱也位		华本华			蓝天玉				方林祥							周唐生
张志洁		周金法		蔡开城	刘玉法												徐茂连
														沈仲元			
										张福祿	邝清顺	胡元成	王保仁	高广太	宋会苓		刘桂林
																	李成兴
										曲合九							刘秀山
陈田福	宋远斌	高言忠	戴仁才														李宪政
唐大争	荆学钦	陶金忠									高恒富						王金虎
孙承伦	于开起	高岩中		王立心	孙丰忠	车子明	李树怀								郑金宝	赵阿康	高春宝
邹文泉			王立欣	董浩亭										张同志	严同志	张同志	刘春刚
																	刘尚高
																	张富业
																	刘金根
																	张洪根
																	柳应进
																	戚兴渭
					胡存胜	刘洪顺	蔡子珍	李承祖									
马连长				徐三						王传法							陈同志
																	白其祥
																	女同志

红门访碑

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解放泰安的战斗结束后，为铭记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新四军第一纵队在泰山南麓建造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找到当年树立的纪念碑，缅怀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家乡英烈，成了我们此行最强烈的愿望。经陵园管理人员介绍，该纪念碑位于泰山南麓，是徒步登泰山的必经之地，来回需步行 2 个多小时。此时已时值 10 点 20 分，为早去早回，我们相对体力较好的 6 人，说走就走。

3月初的泰安，虽说只是初春，但连续的晴天加上时近中午，也已骄阳似火。出陵园大门后，因人生地不熟，加上各种误导，我们走错了方向，竟然找到了位于泰山西麓普照寺边的辛亥革命胶州烈士纪念碑。后经与陵园管理人员微信联系，收到了定位，依照导航折回近半小时的路程后，终于来到了泰山红门入口，此时的我们早已口干舌燥、浑身燥热。仰望陡峭的泰山登顶之道，不禁心生犹豫，但强烈的使命感在催促着我们，经过近20分钟的攀登，通过万仙楼的红门检票口，在往北百余米处，一座屹立在苍松翠柏中的高大纪念碑映入了眼帘。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们如同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显得格外激动。

纪念碑高11.1米，分三层。底座为须弥座，高0.95米。中层为四棱柱体，高3.56米，四面宽度皆为2米，并各镶嵌磨光石面一块。南侧正面是一纵三旅政委何克希撰写的《烈士纪念碑志》，其余三面刻着726名烈士姓名及已确定的籍贯。上层为梯台形碑身，高6.5米，四面刻着题词。南面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由新四军第一纵队政委谭启龙题写。西面的题词为：“英名与东岳并寿，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北面的题词是：“先烈们，你们的死重于东海泰山，永垂不朽。”东面的题词是：“功业同日月争光，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鼓舞着我们勇敢前进，我们要为完成你们未竟事业而奋斗到底。”原纪念碑于1947年被国民党毁坏，该碑为1953年3月重建。

站在纪念碑前，我们找到了碑上刻着的杨永灿、杨槐青、余桂灿、周金贤、魏伯贤、郭章安、周永春、寿忠贵、张才裕、何月灿等10位诸暨籍烈士的英名。我们凝望着那一行行烈士的英名，耳旁仿佛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眼前浮现出一纵三旅八团的战士一个个似离弦之箭冲上云梯，前赴后继，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将红旗插上泰安城头的情景。

我们吟诵着饱含深情的碑志：“新四军一纵三旅，原系浙东抗日纵队。过去驰骋淞沪，转战四明、会稽，直到日寇无条件投降，伟大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结束。受降开始，我淞沪浙东健儿，为贯彻我党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继念相忍，为国至意，毅然撤至山东。其间，经过钱塘、黄浦、长江诸大河，沪杭甬、陇海等铁路，公路则难数计。叠突重围，历尽艰险。澈浦之战，粉碎了反动派袭澈阴谋；沪郊屯兵，摇撼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恶梦。泰安攻城，三日得手，民间传为奇谈，前未曾有……”深深地感受到了何克希政委在撰写《烈士纪念碑志》时，对牺牲的江南健儿那份痛惜、爱怜和自豪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诸暨的英烈们，你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于泰山脚下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但你们的英名与泰山同在，你们的精神将万古长青！家乡人民为你们而骄傲！英烈们，安息吧！



千里寻访解放泰安时牺牲的诸暨英烈

闻 宣

1946年6月和1947年1月，有31名诸暨籍革命军人在泰安县战斗中光荣牺牲。

时间虽然已进入2023年，但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追忆当年战斗，寻访烈士足迹，在做好查资料、访后代等功课之后，组织学术委员带着课题赴泰安考察调研。

3月7日上午8时40分，来到泰安革命烈士陵园。在陵园管理人员的安排下，首先整齐列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向烈士静默并敬献花篮。接着，双方进行交流座谈，陵园管理服务中心孙副主任等人员热情介绍和解答问题，并提供了事前准备好的有关宝贵资料，我会副会长方忠敏也赠送了特地带来的《金萧烽火》《碧血丹心——诸暨烈士英名录》等书籍。

占地80余亩依山而建的泰安革命烈士陵园金山墓区，有青砖墓500座，当

时在泰安县战斗中牺牲的诸暨籍烈士是否都能在这儿寻找到呢？

交流座谈后，学术委员们在陵园管理服务中心孙副主任等的陪同与引导下，顺利地找到了刻有诸暨籍杨永灿、郭重安、周锦贤、周永春、魏伯贤、余桂灿、洪山玉、杨槐庆等 8 位名字的烈士墓。随后，大家参观了泰安革命历史纪念馆。

上午 10 时后，秘书长张建国、理事孙晓群以及部分学术委员在会议室继续与陵园管理服务中心孙副主任交流，着重就如何在墓区 300 余名无名烈士墓中查找其余 24 位诸暨籍烈士遗骸进行研讨。

同时，副会长方忠敏、副秘书长李科才、理事郦林春以及部分学术委员，又根据线索在墓区中继续寻找 1947 年 7 月单独为第一次解放泰安牺牲的烈士而立的一块纪念碑，那上面刻有牺牲的诸暨籍烈士名录。临近中午 12 时，终于在墓区深处东北方的泰山红门上方见到。

中饭后来酒店安顿好，顾不上休息，秘书长张建国与副秘书长李科才又马不停蹄地带着组员和赠送的书籍，分别前往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

到达后，两组人员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与受访方进行了长时间地座谈交流，增进了彼此了解，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籍、资料和信息。退役军人事务局聂副局长事前专门看了我会的网站，在座谈交流中称赞我会所做的工作。

在这次考察中，副秘书长李科才意外发现一个疑问，即诸暨籍烈士墓上的名字郭重安，应该是郭章安的误刻，经确认核实已向陵园方反映。

学术委员杨威林正在整理父亲当年的战地日记，日记中也记载了解放泰安时的情况。为了验证父亲日记中记录的行军路线，很想获得一份当年的山东地图，没想到在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竟然保存着抗战时期日军绘制的地图，并在地图中惊喜地找到了部分父亲日记中记录的地点。

通过考察调研交流活动，学术委员们受到了一次革命精神、坚定信念的洗礼和教育，心中更加充满了对先烈的敬仰与崇拜之情，纷纷表示要忠诚于中国共产党，为切实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作出贡献！

追 寻

方守根 杨黎建

3 月 10 日下午的暨阳城，天气晴朗。

我电话约请了革命烈士魏伯炎的女儿、退休教师魏珠华同志，告知我与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同志 3 月 6 日去山东泰安拜谒革命先烈的情况。



魏老师家住诸暨市内浦阳江畔的帝景小区，小区对面是沿江而建的体育公园，这里环境清静，景致优美。

我邀请魏老师到她家门口的公园座谈交流，魏老师一口答应，如约而至。



今天见到的魏老师，已有 79 岁的高龄，满头银发，清瘦的身躯，一张略显红润的脸。

坐下后，我简要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和家况。

“魏老师，作为烈士的后代，在你的记忆里，你是否知道你的父亲以及有关他的一些事吗？”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我以前听我的爷爷奶奶说，我 2 岁时就没有父亲了。父亲先是参加泌湖乡一带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小三八’部队，还给当时的领导人何文隆当过警卫员，后来又随金萧支队，1945 年 9 月新四军北撤，1946 年 6 月牺牲在解放山东泰安的战斗中，他当时是冲锋排的排长。”说到这里，魏老师两眼含着泪花。

“你的父亲牺牲后，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又问魏老师。

“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女儿，为了生活下去，母亲改嫁到邻村的一户农民家庭，所以，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给爷爷奶奶每月发五元钱的抚恤金。”

“魏老师，我们向政府有关部门查阅了你父亲的革命经历和牺牲情况，你父亲 1937 年 8 月就参加革命并入了党，是个资历很老的革命前辈。你能否提供一点有关你父亲留下的遗物？”

“没有，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只听爷爷奶奶说他已牺牲在泰安，也不知道他的遗骨在哪里。”

听着魏老师心酸的诉说，我的心情也越发沉重起来。我想，她父亲牺牲时自己还只有 2 岁，能知道点啥呢？！

我接着问魏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起才关心自己的身世？”

“我小学毕业后，16 岁那年参加诸暨师范的短期师资培训班，培训结束就去家乡的小学当老师，才关心起父辈的事。”

“魏老师，今天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你，我们这次一行 13 人去泰安追寻烈士足迹，在泰安烈士陵园纪念馆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在安葬有 500 多位泰安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群中，找到了你父亲的墓穴，墓碑上写着赫然醒目的大字‘革命烈士魏伯贤同志之墓’以及你父亲的简要生平。”



这时，我从魏老师沉甸甸的心情中揣摩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见到了她脸上露出一丝喜悦，听到了她感激的话语。

泰山挺立，丰碑永恒

——追寻泰安战斗牺牲的诸暨籍英烈足迹

邴林春

多少年来，一个梦想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底，那就是亲临山东，去追寻父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泰安、济南、莱芜、孟良崮……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2023年3月上旬，由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才让我圆了这个梦！

在此之前，我关注过四份相关的资料：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发行的会刊《浣江大地》第五期《岁月无情人有情》、诸暨市民政局编撰的《碧血丹心》关于泰安牺牲的31位革命烈士的记载、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百旅之杰·二十军史话》、人民解放军关于五次泰安战斗的介绍。第一份是根据魏伯炎烈士的爱人寿菊罗口述整理的革命军人的爱情故事，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第二份是全面介绍，31位革命英烈的史料，具有完整而概括的特点；第三份对第一次泰

安战斗有较为详实的记载；第四份让我对解放战争时期在泰安先后发生的五次战斗有个全面了解。

3月6日，我们乘坐高铁启程出发了。久违的春光，伴随着我们一路北行；千里的路程，召唤着我们追寻英烈！我们肩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前往山东省泰安市寻找在当地牺牲的31位革命烈士的足迹。一路上，望着窗外掠过的江南丘陵、黄淮平原，我思绪难平，当年父辈们随军北撤，战士们在山东这块热土上冲锋、攻坚、拼杀、流血，但是许多烈士已经永远长眠在北方了。

3月7日，我们来到位于泰山脚下的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始建于1953年，占地80余亩，依山而建，气势恢宏。我们在会议室同管理人员简单交流中，获得了一份重要的信息：陵园管理处事先已经准备了整个陵园的分布图，并标注了可以查询的烈士姓名，为我们查询烈士提供了快捷的效率，我们由衷表示感谢。

在管理人员陪同下，我们沿着台阶缓缓而上。望着高高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向烈士们默哀。随后，我们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环绕一圈。纪念碑基座南面是英烈们冲锋陷阵的浮雕，北面是泰安市委市政府撰写的碑文。

纪念碑的后面，就是514位革命先烈长眠的陵区。我们经过核对，找到了8位诸暨籍烈士的墓：杨槐青、余桂灿、魏伯贤、周永春、周锦贤、郭章安、杨永灿、洪山玉。

根据管理人员介绍，整个陵区仅有179位烈士留下了姓名，还有335位烈士难以查找姓名。听了介绍，我们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表。当年敌机的轰炸、战斗的残酷，是烈士们姓名难以考证的直接原因。

随后，我们得知另有一块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泰山景区，刻有1946年6月在第一次泰安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姓名。我们听后立即出发寻找，虽然起初走错方向，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几经转折，终于在泰山景区步行登山入口处的万仙楼景点上方找到了这座纪念碑。

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原系1946年7月为纪念新四军一纵三旅（前身为浙东抗日纵队）在第一次泰安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纵队副政委谭启龙题词，旅政委何克希撰写碑文。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此碑被毁；1953年3月重建。碑身正面镌刻着何克希撰写的碑文，其余三面镌刻着726位烈士的姓名、职务、籍贯。

“诸暨籍的烈士，我们代表诸暨的父老乡亲来看望你们了！”一声声的呼唤，让七十七年的时光凝聚在今天！一声声的呼唤，将一千八百里的路程浓缩在这里！碑文无言，青山无言；丰碑耸立，泰山耸立！此时此刻，任何话语都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

午后，我们兵分两路，赶赴泰安市党史研究院、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从两个部门提供的翔实史料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当年这场战斗的真实情况……

1945年9月下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根据毛主席、

党中央的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忍痛告别浙东父老乡亲，全体北撤。经过艰难曲折的行军，同年11月17日在江苏涟水改编为新四军一纵三旅。随后部队继续北上，1946年1月初进入山东境内，最终完成了北撤的战略任务。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经过反复谈判，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定于1月13日午夜生效。1月7日，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为山东野战军；蒋介石密令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国民党军队连夜在各地行动起来。

当时，从徐州通往济南的津浦铁路，有两个地方成为山东境内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兖州、泰安。山东铁路沿线驻有尚未退出中国的日军洼田旅团；兖州城高沟深，碉堡林立，驻有伪军吴化文部7000多人；泰安北靠泰山，西控铁路，驻有伪军宁春霖部4000多人。

1月8日至13日，山东野战军命令一纵一旅、二旅以及鲁南、鲁中地方部队强攻兖州城，血战五昼夜，终因国共两党颁布的停战令正式生效，我军在13日24时奉令停止战斗。

我军在攻打兖州的同时，一纵三旅奉命占领了泰安车站，在西关实现了对泰安伪军宁春霖部的包围。此后在我军围困期间，宁春霖匪军不遵守停战协定，竟向我军射击200多次，我军战士愤怒至极！

初夏时节，国民党出动50万军队，开始大举进攻华东新四军。4月25日，为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山东野战军命令新四军第一纵队以及鲁南、鲁中地方部队，务必夺取泰山脚下的泰安城。

6月7日22时，第一次泰安战斗打响了！

西关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我军三旅八团、九团和一旅一团，进攻西关守敌；一旅二团、三团进攻东关和南关守敌；三旅七团防备济南方向的敌军援兵。

西关方面，我军冲破敌人的防线，迅速进入巷战。九团占领过街楼、教场口、财源街；八团占领粮食市街、下河桥，同九团会合，冲向电灯公司。敌人被迫后退，凭借高大建筑物，固守在基督教堂、伍家庙、电灯公司、天水观负隅顽抗。

8日下午，一团首先攻入伍家庙，随即冲向基督教堂。敌军在基督教堂前面的一排平房架起机枪疯狂扫射；我军一团战士已经冲到平房下面，敌人机枪打不到，就投下手榴弹，我军伤亡数人。战士杨根思是一位投弹能手，立即冲到开阔地，连甩18颗手榴弹。战士们趁势砸开平房门，冲向基督教堂。敌人疯狂还击，一颗子弹击中杨根思的脸部，瞬间满脸是血，战友赶紧为他包扎脸部。杨根思依然坚持战斗，双眼虽然被包住，但是在班长指挥下，他凭着过硬本领，扔出的两颗手榴弹都精确命中目标！

与此同时，九团攻占天水观、翠英中学；八团攻占电灯公司、济博医院，敌人逃往内城。16时，西关被我军全部攻占。

东关和南关方面，我军二团、三团也先后获胜。但是，一旅参谋长邱玉权在南关战斗中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而牺牲。

9日，敌军多次向北关突围，却被我鲁南、鲁中地方部队火力封锁。敌人的突围计划失败后，就以岱庙（伪军旅部）、伪县政府作为顽抗的据点。

10日18时，我军在做了重新部署之后，以西门、南门作为主攻方向，向泰安主城区发起了全面总攻！

攻城部队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奋勇越过护城河，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架梯登城。三旅八团在西门以南打开突破口，杨周全首先将红旗插上泰安城头；战士们迅速冲入城内，乘胜攻占了伪县政府！

九团战士也在西门以北登上城头，在八团战友协助下，22时攻占了盘踞在岱庙的伪军旅部，并向北门冲去！

一团、三团在南门两侧登城，虽有伤亡，依然奋勇攻入城内。敌人纷纷往东南、东北方向逃窜；但是我军二团也已攻入东门，分路阻击敌人。遗憾的是，伪军旅长宁春霖带领少数护卫人员，从东北角的地道逃窜，未能捕获。

泰安之战，我军经过四昼夜的浴血奋战，全歼敌军副旅长以下4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并缴获大批装备精良的武器，拔除了津浦铁路上的一颗虎牙。

泰安城解放的重要意义在于人民解放军城市攻坚战取得成功的首例，为我军今后几次泰安之战，以及夺取更多的大城市树立了信心，也为最终解放全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月14日，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美国制造的新式轰炸机，对我军进行疯狂报复。敌机在我军上空轮番轰炸；当时我军缺乏防空能力，没有制空权，再加上泰安地处平原地带，根本无法隐蔽，三旅指挥部遭到轰炸，一纵三旅战士伤亡惨重。

泰安之战和遭受空袭，我军一纵三旅牺牲的指战员多达726名，其中包括诸暨籍的28位革命烈士，他们是：杨雪章、杨槐庆、慎祖年、张才裕、王庭均、洪文德、许灿夫、杨浩余、郭章安、周永清（春）、惠情海、石德扬、朱奎苗、闵忠法、俞三梦、寿中贵、周保福、魏伯炎、何月灿、郭伟、孟汉山、孟金波、蒋延泰、周锦贤、余贵灿、杨云灿、俞成章、沈伯祥。此外，还有郦云千、方云泉、陈保祥3位诸暨籍烈士，也是在泰安县其他战斗中牺牲的。



一纵三旅及二旅攻打泰安，机枪掩护，准备出击

新四军第一纵队，原系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由淞沪支队、第三支队、第五支队、金萧支队组成。几年来，这支部队由何克希将军亲自带领，驰骋浙东，抗击日伪，保家卫国。这支部队来自会稽、四明、淞沪，跨越钱塘、黄浦、长江，从吴越大地转战到齐鲁大地，虽然攻下了泰安城，但是这么多的战友兄弟却永远离开了。

一幕幕往事涌现眼前，一个个身影再难留住，将来如何面对浙东父老？如何面对江南故土？如何放得下这么多年的战友情深？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将军的泪，烈士的血，化作泰山上那座永远挺立的丰碑，与天地同在，与日月争辉！

我们沿着父辈的征途来到山东，来到泰山，向革命先烈敬礼，向诸暨籍烈士们带上一份家乡父老的怀念之情。英雄们，你们没有离去！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烈士们精神不死！

探访红色之旅，追寻烈士足迹

徐治贵

2023年3月6日，阳春三月，春光和煦。时隔77年后的今天，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一行，带着诸暨父老乡亲的嘱托，踏上了千里寻访之旅。寻访1945年9月新四军金萧支队北撤山东后编入华东野战军一纵三旅，在泰安战斗中牺牲

的 31 位诸暨籍烈士的英雄足迹。

3 月 7 日，会员们早早地来到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市革命烈士陵园，在陵园管理人员陪同下，首先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向英雄的烈士默哀，并敬献花篮，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哀思和崇敬。

陵园里长眠着 500 多位革命先烈，在陵园管理人员的陪同寻找下，墓地上找到了有名有姓的诸暨籍烈士 8 位，分别是：岭北镇岭北周社区周永清、姚江镇江藻社区东沙自然村郭章安、山下湖镇泌湖村大宣自然村魏伯炎、枫桥镇洄村周锦贤、浣东街道高湖村西高湖沿自然村余贵灿、暨阳街道浣纱村的杨云灿、五泄镇泄峰村青口自然村的杨槐庆、安华镇三联村大园自然村的洪文德。其余 23 位烈士由于当时战斗激烈和敌机轰炸等原因，墓葬已成为无名烈士墓，我们深深感到遗憾！

在陵园管理人员的陪同解说下，人们齐声呼喊：“诸暨籍的烈士，我们代表诸暨的父老乡亲来看望你们了！”一下子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金萧支队北撤山东后的壮烈历程和战斗足迹。1946 年 6 月 7 日发起的泰安之战，逐渐浮现在人们的面前！

1946 年 6 月 7 日晚 10 时，攻城战斗打响，一纵三旅开始向西关处守敌发起猛烈进攻，先后占领教场口、财源街等地点。

8 日下午 2 时，我军开始向西关守敌发起攻击，旅炮兵群集中火炮，摧毁敌人火力工事、铁丝网多处。下午 4 时，一纵三旅全部肃清西关外围的国民党守敌，直达西关城下。与此同时，一旅三团对南关守敌实施进攻，三团集中优势火力，浴血冲杀，南关守敌纷纷溃逃，三团控制南关。

9 日，一旅二团占领东关，败退至城内的国民党军先后三次向北门突围，均被泰安独立营击溃。

10 日 8 时，我军向泰安城垣发起总攻。在旅团炮火的掩护下，主力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激战数小时，残敌撤至岱庙内负隅顽抗，我军乘胜追击，攻入岱庙，经过激烈战斗，退守岱庙的残敌被我军全部歼灭。

泰安战役，经过四昼夜的激战，歼敌 4000 余人。其中俘虏敌副旅长、参谋长以下 3000 余名，缴获迫击炮、轻重机枪、子弹等大批武器弹药。

6 月 14 日，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出动大量飞机，实施轮番轰炸。我军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部队完全暴露在敌机之下，旅指挥部被炸，战士死伤无数。此次战斗和空袭，我军将士牺牲达 700 余名。

为了缅怀革命烈士，时任浙东纵队第三旅政委何克希，为死难烈士撰写了铭文，镌刻在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上；纪念碑的其余三面镌刻着第三旅在解放泰安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700 多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泰山巍巍，青山不老。长眠在泰山脚下的诸暨籍英烈们，你们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无论什么时候，将永远记住你们——敬爱的革命烈士，将永垂不朽！

追忆英烈 寻访足迹

寿绍方

3月7日，随同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一行，带着英烈家属的愿望，来到山东泰山之下的烈士陵园，寻访诸暨籍在解放战争时期泰安之战牺牲的31位英烈足迹。

当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泰安烈士陵园的路上，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当年的热血青年，远离故土和亲人，长眠于泰山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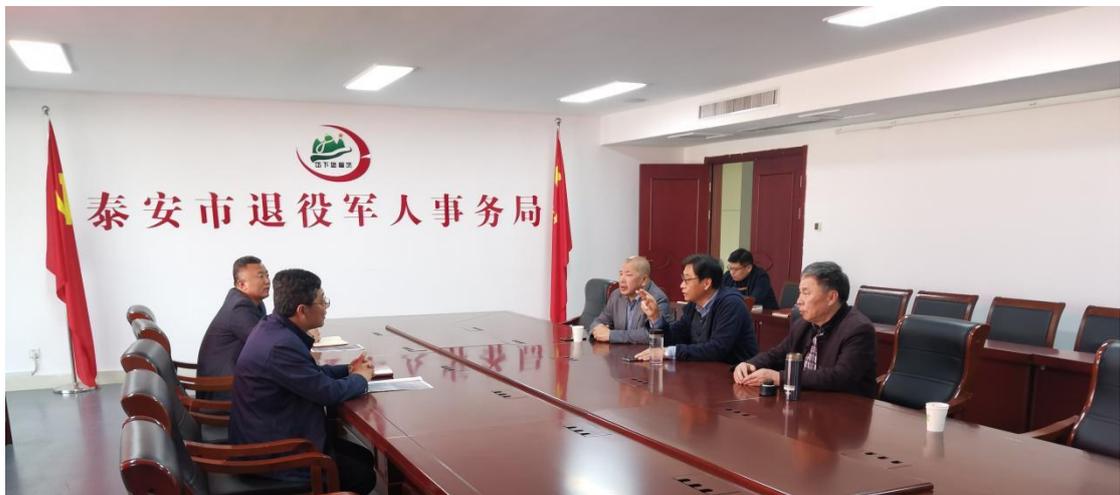
这是一批当年的金萧勇士，1945年9月金萧主力北撤的部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壮烈牺牲于泰安战场。

在我们的寻访中，得知这些英勇志士，除个别外，大部分都无妻无儿，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成为祖国和家乡人民永远惦记的有功之臣。

在烈士陵园墓区，我们含泪寻找，致细辨认，通过文献对比，成功寻找到杨永（云）灿、郭章安、周锦贤、周永春（清）、魏伯贤（炎）、余桂（贵）灿、杨槐青（庆）、洪山玉等8名诸暨籍烈士，其余23位烈士都安葬在无名烈士墓之中。在我们寻访出发之前，我特地回了一趟老家，受牺牲在泰安的烈士亲属之托，也未能找到烈士之墓，深感十分遗憾。

在寻访中，我还了解到本村“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模范”，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的寿志高同志也参加过泰安之战，并在泰安留下了战斗足迹。

据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管理服务中心介绍：为进一步弘扬革命传统和红色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他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烈士原籍和烈士家属的联系交流，加大文物史料的征集和挖掘，提升革命烈士的展示水平。同时，还提到我们诸暨籍的几位烈士，每年都有亲属前去祭祀和寻访。



在我们结束寻访，奔驰在飞速的列车上，我一直在默默地静思，中华民族的解放，功不可没的烈士，像泰山一样巍然屹立在我们的心上。真像郁达夫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寻找失落的英魂

——泰安千里寻亲记

杨威林

我加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才一个多月，对这方面的工作方式都还不是很熟悉，就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要去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泰安市替 76 年前为了解放泰安城而英勇牺牲的诸暨籍烈士寻找他们的埋身之地，深感责任重大，心里很是有些忐忑，可是转念一想这些烈士都是我现年 97 岁的老爸杨伯成一起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北撤的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 3 旅生死与共的战友兄弟，能为他们做点事，作为大侄子的我自当是责无旁贷！

出发前我连夜研究了所有 31 名诸暨籍烈士的资料，这场悲壮的战斗发生在 1946 年 6 月，而整支队伍刚刚在 1946 年 1 月由金萧支队（游击队性质）整编而成山东野战军，成军还不足 5 个月，而且这一路上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没能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训练，面对的又是这样的城市攻坚战，所以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的诸暨籍战士竟然高达 31 人！他们同在一个编制之下——英勇的山东野战军一纵 3 旅 8 团！

在这 31 名烈士中最大年纪的郦云千烈士 41 岁，最小的孟金波、蒋延泰烈士在牺牲时年仅 19 岁！全部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这是人的一生中最青春、最美好的年龄！

他们其中有：连级干部 1 人，排级干部 7 名，5 名正副班长，卫生队长 1 名。你能想象的出他们个个都是战士中的精英，他们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顽强！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乡村，却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自己的生命就都停止在了同一时刻——1946 年 6 月的这一刻！仅仅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次战斗中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牺牲了自己而把今天的美好生活留给了我们，想到这些不禁让人扼腕叹息，热泪盈眶……

按照既定计划，在 3 月 7 日我们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一行 13 人在副会长方忠敏、秘书长张建国的带领下，乘坐高铁顺利的来到了泰山脚下的泰安城，

当我第一眼看到泰安市革命烈士陵园，就被背靠泰山的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给震撼了！

高耸挺拔的碑体，朴实坚毅的底座，加上雄浑有力的英雄纪念碑几个大字——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我们在泰安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了对烈士纪念碑的伫立默哀，敬献花篮等仪式，把家乡人民对英烈的缅怀之情带到了他们的牺牲地！泰安烈士陵园吴主任毫不掩饰她对于我们华野英烈的崇敬，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是你们这些来自南方的，个子不高的华野解放军战士，不怕英勇牺牲，帮助我们解放了泰安城！”

懂得感恩的泰安人民也给予了这些英勇牺牲的英烈们最高的礼遇，就在泰安城最中心位置（烈士陵园通常都建在稍偏远的半山腰）背靠泰山修建了烈士陵园，是国家级的革命教育基地，整个园区 80 多亩，统一的青砖墓葬有 500 多座，每位烈士都是一座单独的墓葬，这在同类墓地中也属罕见，其中有 300 多座是无名烈士墓，可见他们在泰安人民心目中有那么高的地位！

在陵园的管理人员的积极专业的配合之下，我们找到了 31 名烈士中杨永灿、郭重安、周锦贤、周永春、魏伯贤、余桂灿、杨槐青、余山玉 8 位烈士的墓地，并在目的表格中标注好位置，方便将来烈士亲友家人前来祭奠，虽然找到 8 位烈士墓地已属不易，可是我们的张秘书长并不因此而满足，还召集我们和陵园孙副主任深入研讨了下一步计划，名单上剩下 23 位烈士如何和 300 多无名烈士墓葬，是否能利用现代 DNA 技术进行比对认亲，一旦时机成熟有望为更多烈士找到墓葬！而副会长方忠敏等 6 位委员又找到了特为纪念 1947 年 6 月第一次解放泰安战斗树立的一块纪念碑，这块碑上完整的记录了此次解放泰安牺牲的 500 多名战士以及随后遭受敌机轰炸牺牲的战士合计 726 名烈士的姓名和已确定的籍贯，其中就有诸暨籍的烈士！

我们找不到对当时这场战斗过程的详细描述，但是依稀可以从时任山东野战军一纵 3 旅的司令员（原浙东纵队政委）何克希将军所撰的碑志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状况：山东一纵 3 旅是由浙东游击纵队组成的抗日武装整编而来，他们“为国至意，叠突重围，历经艰险”，“激浦之战，粉碎了反动派袭激阴谋；沪郊屯兵，摇撼了帝国主义者侵略恶梦”，北撤之路是一路艰辛！



一纵三旅在西太平村召开阵亡烈士大会

虽然“泰安攻城，三日得手，民间传为奇谈，前未曾有”，但是在面对的毕竟是装备有“美国新式械具”的国民党正规军，这场战斗历经三日四夜，一纵全歼守敌 4000 余人。其中，毙伤 1000 余人，俘敌 3000 余人，各路担任突击任务的指战员迅猛冲到城墙脚下，冒着敌人的枪弹架梯攻城，8 团 2 营 4 连杨丹全突击小组率先将红旗插上泰安西门城头。为了歼灭岱庙内的敌军指挥部，3 旅 8 团实施正面突破，开展连续爆破，攻势之下，除宁春霖率少数骨干由东北角秘密地道出城逃跑外，余敌悉数被歼。

激战过后解放了泰安周围广大地区，激烈的战斗也让部队付出惨重代价：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旅参谋长邱玉权及 200 余位指战员壮烈牺牲！

碑文最后写道：“此役，由于我党教育全军，对人民应尽其全忠全孝，以全心全意服务人民，而烈士忠魂正宜不朽！”读到这里我沉默了，只觉得鼻间有些酸楚，瞬间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共产党人的无私和无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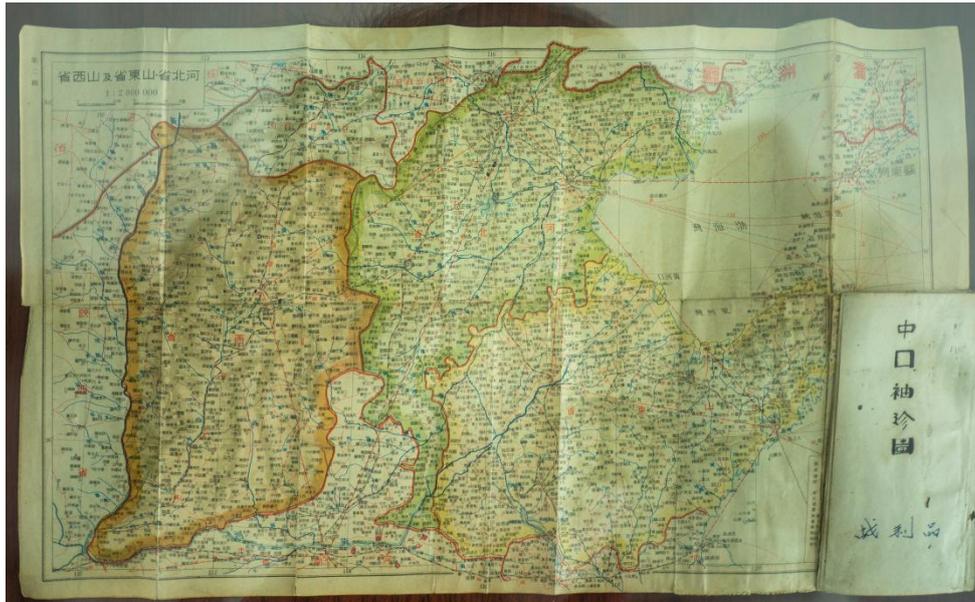
下午我们又兵分两路分别去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作深度交流，我在党史研究院这一组，党史研究院的封彦君主任很热情的介绍了他们关于华野这段历史做的相关研究，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还把他们的研究出版的学术书籍送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四位委员与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封彦君主任（左一）合影留念

当封主任得知我老爸留有战地日记的情况之后，非常激动，赞扬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是国家和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等到我整理完毕之后能和他们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向她征询有关 1947 年的山东地图（用于验证我老爸日记中间记录的行军线路，驻扎地点）时，她很认真的想过之后，竟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这里还保留有一份抗战时期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图绘制得非常详细，比我们民国时期的地图强太多了（他们那时候测绘技术比我们先进很多，是为侵略中国提前做了充分准备）。说完就立马联系了管理员，很快拿到了钥匙，带我们来到了他们的资料室，在看到那张陈列地图之前，说实话我整个人都有点晕晕的，我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我在北京拜访了北师大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之后，一直在为他提出的要我把我老爸的日记里的行军路线和地名做验证，我正为此烦恼着，这样的地图你让我去哪里找啊？！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竟然意外让我得到了！

当我面对着这张已然发黄的地图（它都快 80 岁了），我还一直都不太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抗战时期的山东地图

在按下相机快门的时候我的手还激动得有些发抖，一连拍了几张之后，我的呼吸才慢慢平复下来！这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就算是我们能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的地图，也很难找到我老爸日记中记载的“大李庄”“朱宅”“马前楼”，他们最小的地方可能就是“镇”一级，村庄几无可能，我真的是大喜过望，这趟泰安来得太值了！



我向封主任介绍我老爸日记里的详细情况

泰安之行让我很受感动和感慨，感慨于那些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的老爸的那些血浓于水的兄弟；感动于泰安人民对烈士的真情义；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老爸那么看轻职位和待遇，说什么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他们能活着就算是“赚到

了”最大的便宜！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个人私利，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

最后我想用何克希将军碑文的最后一句话来做整篇文章的结尾：“泰山，往昔用示统治地位永存；而今而后，则更象征人民不朽。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烈士们精神不死！”

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奉献牺牲的革命军人和共产党人，你们永远会像泰山一样在人民心中永存！

我们一定要尽力保留和挖掘为党为国的红色记忆，努力再现历史真相，让革命先烈的精神代代相传！

会里会外

我会走访慰问“三老”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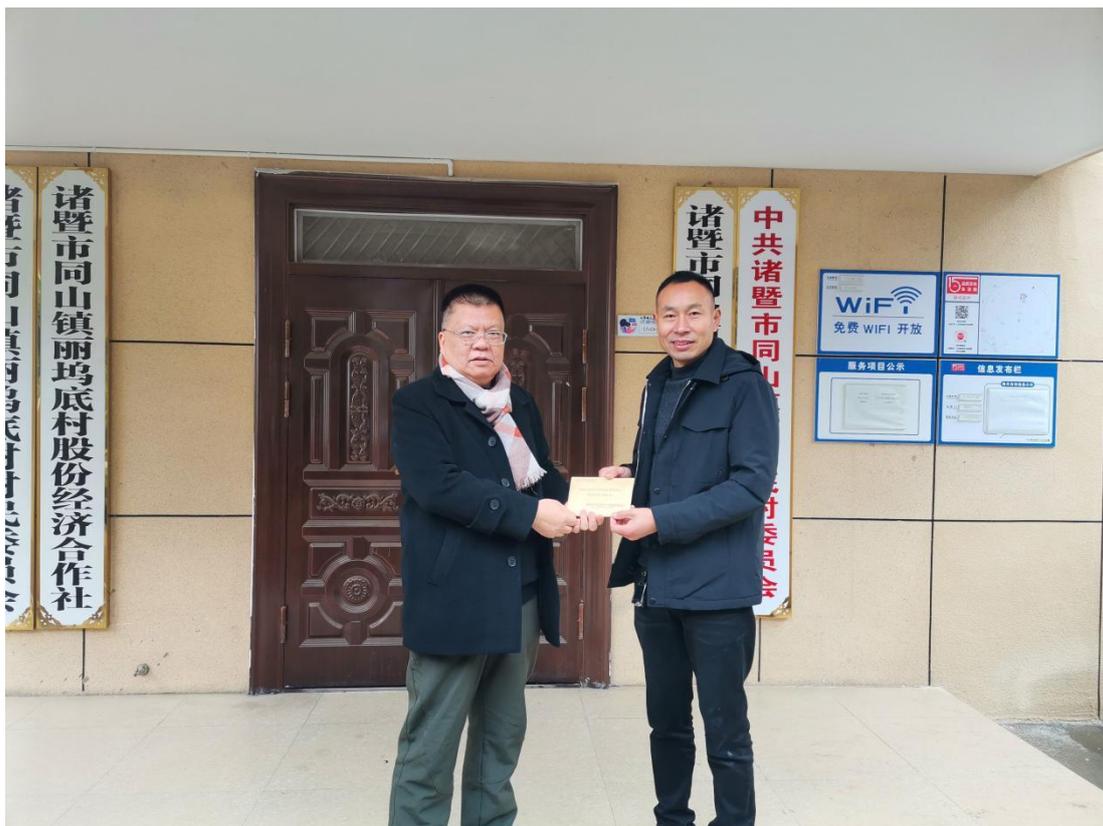
李科才

疫情消退，万象更新。从2023年2月8日开始，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品灿，副会长方忠敏，秘书长张建国，副秘书长李科才，以及理事赵仕仁、袁杨根、郦林春等分成三组，分别走访慰问了18位“三老”人员和2户“三老”人员家属。

“三老”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农村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在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三老”人员是我会每年度的一项重要活动，受新冠疫情影响，为预防高龄高危人群受到感染，走访慰问活动因故推迟至元宵节后。

本次走访慰问的18位“三老”人员主要住在暨南、浣东、大唐街道，和姚江、枫桥、山下湖镇等地，其他2户是原在慰问走访计划之内而于元旦后过世的“三老”人员家属。慰问组成员分组上门慰问，详细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同时奉上慰问金和新编印的《浣江大地》会刊，鼓励他们要勇于面对生活，保持乐观的心态。

此外，研究会还向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联系点同山镇丽坞底村和店口镇侠父村送去补助经费。



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祭奠金萧支队烈士

闻 宣

3月28日7时30分,36位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前往桐庐县新合乡——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后勤基地,祭奠革命先烈。

红色大巴车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于大山中,上午9时正到达桐庐县新合乡山桑坞自然村村口。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村口的金萧支队革命教育基地牌坊。穿过这座牌坊,右侧即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在青山拥抱、溪水环绕中显得格外寂静、肃穆!



镶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镀金大字的纪念碑屹立在纪念馆后方,这是给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230名金萧支队烈士修建的。据核实,牺牲的烈士中诸暨籍的竟有101位。会员们来到烈士碑前静默肃立,向烈士默哀,表达深深的哀思,敬献花篮和白菊。大家还怀着无比崇仰的心情环绕纪念碑一圈,期间不时地驻足凝视,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



随后，会员们参观了纪念馆，重温金萧支队的光荣历史，聆听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考察了金萧支队后勤部、被服厂、报社、后方医院、后勤联络点等旧址，追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岁月。

1948年9月，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在诸暨马剑成立后，以诸暨、浦江、桐庐、富阳四县毗邻地区为作战中心，以四管乡（新合乡）为后勤基地，广泛开展斗争，至1949年3月7次外线出击，驰骋浙西18个县境，战役100余次，歼敌3000余人，取得会师皖南、开拓严衢、策反湖州、直逼杭城的战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又密切配合南下大军，迅速解放杭州和众多县城。

缅怀先烈敬英雄，继往开来征程勇。这次祭奠革命先烈活动，使会员们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革命历史教育，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表示不忘初心，紧跟党走，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作出应有贡献！

我会派员赴陶朱街道金村和姚江镇梓尚阁村调研

寿国明

4月25日上午，副会长陈志堂、方忠敏以及会员寿国明前往陶朱街道金村红色记忆馆，调研核实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的诸暨人情况。

金村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红色小莫斯科之称，在革命战争年代，共有10位同志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分别是：金城、金树望、金嘉岭、金铃、金万青、金戈、金仁钦、钟华、陈复君、郦怡福（金村女婿）。

该馆总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馆内史料详实，

布展得体，是诸暨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

之前，为调研核实战争年代在延安的诸暨人，我会曾赴牌头镇王家宅自然村。



又讯，为征求对即将开馆的朱学勉纪念馆布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姚江镇党委政府邀请诸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前往坐落在姚江镇梓尚阁村尚武底自然村的朱学勉纪念馆。

4月27日，我会特派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李科才（绍兴市社科专家）、理事孙晓群、会员寿国明，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主任张陈军，在姚江镇党委宣传委员杨狄的陪同下，对场馆内的布局、格式排列、标点符号运用、文字书写规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会副会长陈志堂等拜访周浙平先生

寿国明

2023年4月以来，我会紧锣密鼓地收集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的诸暨人的信息和资料。

5月11日上午，在地方文史研究者俞广平的陪同引荐下，我会副会长陈志堂、副秘书长李科才，以及会员章可萍、寿国明等一行前往应店街镇大马坞村，拜访正在该村度假的诸暨籍老革命钱希均之女婿、周沛然（原名钱理清）之子周浙平先生。

钱希均与周沛然都系诸暨人。钱希均，1922年入上海平民女校学习，1925年入党，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为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中共顺直省委组织科、机要科科长，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秘书长。周沛然，1938年5月经介绍来到延安，7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3年奔赴抗日前线。



陈志堂一行到达后，周浙平先生详细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诸暨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以及在赴延安前后的革命故事。

纪念金萧支队成立 80 周年摄影大赛开启

闻 宣

为纪念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成立 80 周年和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成立 75 周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和展现诸暨乡村的红色、绿色、特色旅游融合发展，提高诸暨乡村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助力诸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诸暨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纪念金萧支队成立 80 周年暨“见证革命老区今日变迁”摄影大赛。

该次摄影大赛征稿启事刊载于诸暨市政府门户网站“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信息公告栏；摄影大赛截稿于2023年7月31日，届时将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和入选作品，在纪念金萧支队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给证书和奖金。

据悉，投稿作品要求紧扣大赛主题，围绕诸暨市境内的革命老区村（居、社区），反映革命老区的红色人文、自然山水等景观，记录革命老区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等，展示革命老区的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与治理的新面貌和新成就。

我会开展“走清风廉路 传红色基因”主题活动

李科才

6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部分会员，开展“走清风廉路，传红色基因”主题活动，赴中共诸暨一大会址纪念馆和王家宅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

早上8时30分，诸暨市联合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红色大巴就载着31名会员，从暨阳街道办事处门口出发，来到中共诸暨县一大会址——位于暨阳街道郭叶柏村郭家坞自然村“滴水道院”。1927年9月，中共诸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与会代表20余人。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诸暨县第一届委员会，并作出了加速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发动罢市罢课、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以及秘密进行革命宣传等4项决议。

纪念馆讲解员、原郭叶柏村老书记郭一均先生为全体会员讲解了中共诸暨一大召开时的时代背景、组织架构和组成人员，以及纪念馆的升级改造情况等等。展馆分为建立中共诸暨地方组织、召开中共诸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等七个篇章。会员们还参观了新建在西南侧红岩上的标志性建筑——高度为19.27米的纪念碑，是按会议召开的年份设计的，碑形如三面红旗，呈逐级攀升之势。学习参观结束后，全体会员及党员分别在纪念馆入口处关于红色记忆的浮雕前合影留念。



随后，红色大巴又载着会员们来到位于牌头镇斗岩村的王家宅革命纪念馆。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个小小的王家宅自然村就有 21 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在整个诸暨市都是绝无仅有的。该村的革命引路人钱之光（1900—1994），曾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钱希均（1905—1989），曾是毛泽民的革命伴侣，也是参加长征的 30 位著名女红军战士之一。